

第 1 章

风险管理概述

本章学习目标

1. 了解什么是风险,对风险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
2. 学习风险管理的由来、概念、作用;
3. 熟悉脆弱性理论、抗逆力理论、风险感知理论、风险放大理论的内容及其应用。

引导案例

恒大债务危机：高杠杆扩张的代价

恒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成立于1996年,总部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经过多年的快速扩张,恒大在全国范围内开发了大量房地产项目,业务范围涵盖住宅、商业地产以及旅游、健康等多个领域。然而,这种快速扩张也伴随着高负债经营的风险。该企业长期以来采用高杠杆的经营策略,以大量借贷支持业务扩张。2016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房住不炒”,逐步限制房地产投机行为。大量房地产企业因为政策限制陷入流动性危机,企业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根据2021年中期财报,恒大有息负债从2020年3月的8743亿元降至2021年6月底的5717.8亿元,但这并未反映全部债务情况。大量负债以“应付账款”等形式存在,媒体统计其显性债务可能达到1.966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此外,恒大还存在大量隐性债务,包括对供应商的拖欠款项和需要支付给政府的费用等。2021年,恒大的财务状况迅速恶化,现金流紧张,供应商付款拖延,股价下跌,债务违约等问题频发。2021年9月8日,恒大通过旗下员工发布消息,停止兑付所有理财产品的孳息与利润,消息传出后在恒大财富的投资人间引发恐慌,事态开始扩大。恒大欠供应商、债权人和投资者总计1.9665万亿元人民币。

恒大的危机导致大量在建楼盘停工,形成“烂尾楼”。根据克而瑞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24个重点城市中有18.6万套房延期交付,占当年新房销售量的9%。这引发了购房者的信任危机,部分购房者开始选择“停贷”,即停止偿还按揭贷款,以此表达对开发商和银行的不满。由于大量楼盘停工,购房者权益受损,部分地区出现了业主集体维权、抗议等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同时,恒大的债务危机对银行体系造成冲击。根据恒大财报,恒大有息负债涉及银行128家、非银金融机构121家,贷款余额3684亿元,境

外债务 1 852 亿元。其中,民生银行对恒大敞口最大,达 293 亿元。虽然总体来看,恒大的金融负债占中国贷款总额的比例较小,但其庞大的隐性债务和高杠杆经营模式引发了市场对系统性风险的担忧。

面对恒大的债务危机,政府和监管机构迅速介入,成立风险化解委员会组织重组,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债务重组案。

资料来源:恒大债务危机[EB/OL]. <https://zh.m.wikipedia.org>.

1.1 风 险

1.1.1 风险的概念

关于风险(risk)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认识,至今尚未统一。提起风险,人们通常的理解是“可能发生的危险”。《韦氏大词典》将风险定义为“面临的伤害或损失的可能性”。在国外,学者更多地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定义风险。广义上,风险被视为一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损失、获利或无损失无获利的情况;而狭义的风险仅指损失的不确定性,即只关注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这种定义方式使得风险的概念更加灵活,能够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以及保险理论等领域。国外学者对风险的定义中,较有代表性的可以归纳为:风险是某种特定的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影响的综合体。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部于 1992 年公布了自然灾害风险的定义:风险是在一定区域和给定时段内,由于特定的自然灾害而引起的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活动的期望损失值,并采用了“风险度(R)=危险度(H) \times 易损度(V)”的表达式。在国内,学者对风险的定义主要强调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和可能带来的损失。风险被理解为在特定环境下某一时间段内可能发生的损失或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偏差。这种定义不仅涵盖了金融风险,还包括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导致的风险,如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国内学者还特别强调风险的社会属性,指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下,风险的内容和形式会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学者们对风险的认识可以归纳为:第一,风险是损失机会和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其中,把风险定义为损失机会,这表明风险是一种面临损失的可能性状况,也可以表明风险是在一定状况下的概率度。当损失机会(概率)为 0 或 1 时,就没有风险。把风险定义为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意味着损失事件的概率介于 0 和 1 之间。第二,风险是损失的不确定性。决策理论家把风险定义为损失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又可分为客观的不确定性(客观风险)和主观的不确定性(主观风险)。客观风险是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偏差,有时称为风险程度。主观的不确定性是个人对客观风险的评估,它和个人预期损失的知识、经验、精神和心理状态有关,不同的人面临相同的客观风险,会有不同的主观的不确定性。第三,风险是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偏差。长期以来,统计学家把风险定义为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偏差度,这与上述客观风险的定义相同。第四,风险是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概率,即一个事件的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客观概率,而不是损失概率。

此外,不同的研究领域对风险定义的理解程度和研究的侧重点也存在不同。其中,公

公共管理学关注政府和公共组织如何管理与减少风险；政治学考察风险如何影响权力关系和治理结构；社会学分析风险对社会结构和个体的影响；经济学则研究风险与市场行为、资源配置之间的关联。具体而言，在公共管理学中，风险主要被视为对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的一种威胁。其目标是通过合理分配资源、优化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的风险。例如，在应急管理领域，公共管理学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应急响应机制，以减少自然灾害或人为事件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在政治学中，风险常常与政治权力的运作和分配密切相关。政治学不仅研究风险本身，还关注风险背后的权力关系、社会不平等及治理结构的有效性。政治学家们试图理解风险如何在政治决策过程中被构建和处理，以及这些风险信息是如何影响公众认知和政治行为的。此外，政治学还关注不同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对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在社会学的视野中，风险被视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与社会变迁、文化观念以及群体行为紧密相连。社会学家们研究风险对社会群体产生的影响，以及人们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认识和应对各种风险。例如，社会学家们会探讨贫困、犯罪、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如何增加特定社区的风险负担，以及这些风险如何影响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福祉。而经济学中的风险管理则侧重于风险对市场行为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经济学家们通过成本效益分析、风险评估和经济模型来理解与管理风险。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下作出最优的经济决策，如在金融投资、保险和市场交易中如何对冲风险以达到预期收益最大化。此外，经济学也关注政策干预如何影响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和行为模式。例如在金融投资风险的概念中，有三种定义：第一种认为风险就是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第二种认为风险应是投资结果损失的可能性；第三种认为风险是与不确定性和相应的不利投资后果同时相联系，只有在不确定性可能给投资者带来损失时，或者说，只有在投资损失具有不确定性时，才构成投资风险，通常以一定置信水平下投资工具所可能发生的最大投资损失计量风险。

从学术上的诸多定义和不同研究领域对风险的理解中我们知道，人们在风险探索和研究中得到了这样一些比较正确的认识成果：风险与不确定性有关；风险是不确定性结果中的一种，即可能发生的不利结果中的一种；风险是可能发生的结果中的那种不利于人们的结果；风险是未来可能不利结果与期望结果之间的差异。根据人们的理解，我们可以通俗地这样描述风险：风险是这样东西，它在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一旦发生，将会给人们带来不利和损失。在所有发生的后果中：已经发生的，不能称作风险；必然要发生的，不能称作风险；给人带来好处的，也不能称为风险。

基于此，风险是指在某一特定环境下，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其中风险是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等要素组成的。同时在某一个特定时间段里，人们所期望实现的目标与实际出现的结果之间产生的距离称为风险。风险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等多重属性，这些属性共同决定了风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还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其发生和影响都受到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影响。

1.1.2 风险的分类

风险的分类是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理论上便于进行研究，在实践中便于帮助

个人和组织识别、评估与应对各种不同类别的风险,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措施加以处置它。由于分类标准不同,风险有许多种不同的分类。

1. 基本风险与特定风险

按照风险的起源以及影响范围不同,风险可以分为基本风险(fundamental risk)与特定风险(particular risk)。

基本风险大部分是由非个人行为,或至少是个人往往无法控制的因素,如经济、政治原因和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一般来说,基本风险造成的损失比较大,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广。这种风险事故一旦发生,任何特定的社会个体都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阻止其蔓延。例如失业、战争、罢工、通货膨胀、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等,都属于基本风险。由于基本风险不仅影响一个群体或一个团体,而且影响到很大的一组人群,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是由某个特定个人的过错所造成的,个人也无法有效分散这些风险,因此,应当由社会而不是个人来应对这一类风险。

特定风险主要是由个人或单位疏于管理造成的,通常由某些个人或者某些单位来承担损失的风险。例如,火灾、车祸、盗窃等风险就属于特定风险。一般来说,特定风险影响的范围比较小,一般只影响个人、企业或者某一些部门,可以通过个人或风险管理单位的风险预测、风险控制和风险处理等加以管理。例如通过保险、损失防范和其他工具来应对这一类风险。

2. 纯粹风险与投机风险

按照风险所导致的结果和性质不同,风险可以分为纯粹风险(pure risk)和投机风险(speculative risk)。

纯粹风险是指那些只有损失机会而无获利可能的风险。例如,自然灾害、人的生老病死等都属于纯粹风险。纯粹风险所致的结果只有两种:一是遭受损失,二是未遭受损失。例如一个人购买了一辆汽车后,他就会面临汽车可能遭受的损失(如交通事故导致的车辆损毁、盗窃、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等)和汽车使用过程中给他人人身、财产带来损害的损失可能性(如不小心撞到行人或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一般而言,纯粹风险具有可保性,即可以通过购买保险来转移风险,其中常见的纯粹风险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房产保险和汽车保险等。

投机风险是指那些既有损失机会也有获利可能的风险。其结果可能是遭受损失、未遭受损失和获利三种情况。例如市场行情的变化,对企业可能造成损失,但对另一些企业则可能有利。再如,购买股票,投资者可能因股票价格上涨而获利,也可能因股票价格下跌而遭受损失,或因价格不变而无损失但也不获利。由于投机风险涉及既有损失机会也有获利可能,因此这种风险不能简单地通过保险来管理,通常需要使用更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和市场策略。例如利用金融衍生合同对冲货币风险、利率风险和商品价格风险等,其原理是将可能遭受损失一方的损失风险转移给可能获利的一方。

3. 静态风险和动态风险

按照产生的环境不同,风险可以分为静态风险(static risk)和动态风险(dynamic risk)。

静态风险是指在经济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一些自然现象和人们的失当行为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例如,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飓风等,以及人为事故如火灾、交通事故等。

静态风险的影响范围相对有限,通常只会影响到部分财产或个人。同时静态风险相对稳定,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是可以预测的。通过保险等方式可以有效管理这类风险,例如企业可以通过购买财产保险来应对火灾或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动态风险是指在经济条件变化的情况下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例如,通货膨胀、汇率风险、罢工、暴动、消费者偏好改变、国家政策变动等带来的损失。动态风险的影响范围较大,甚至可能影响整个社会,往往还会产生连锁反应。同时动态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其管理方法也更为复杂。动态风险常常需要通过分散投资、金融衍生品、市场策略等手段来回避或减轻。

4. 自然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

按照产生的原因不同,风险可以分为自然风险(natural risk)、社会风险(social risk)、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和经济风险(economic risk)。

自然风险是指由自然现象导致的,给人类的经济生活、物质生产和生命安全等带来损失的不确定性的风险。例如地震、洪水、台风、干旱、火灾等都属于自然风险。一般来说,自然风险的影响范围广,可能对广大地区造成损失,且其发生具有不可预测性和难以控制性,但可以通过建立预警系统、加强防灾设施建设、实施应急计划等方式来减轻其潜在影响。

社会风险是指由于个人或团体的行为,包括过失行为、不当行为和故意行为,对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例如盗窃、抢劫、玩忽职守和故意破坏等都属于社会风险。一般来说,社会风险通常与社会稳定、公共安全和卫生相关,影响范围可能从局部到全面不等,可通过法律制度、公共政策、教育普及等手段,提高社会治安水平、增强公众健康意识,从而降低社会风险的发生频率和影响程度。

政治风险是指在国际或国内政治活动中,由于政治变动、政策调整、战争、恐怖袭击等原因造成的风险。例如政权更迭、政治动荡、法律法规变化等。政治风险的影响通常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可能导致经济波动、社会不安甚至战乱。由于政治风险较难预测和控制,企业和个人可通过多元化投资、保险、合规经营等方式来减少政治风险的潜在威胁。

经济风险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由于市场供求关系、价格波动、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导致的风险。例如金融危机、股市波动、货币贬值等。经济风险的影响深入各行各业,可能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造成重大影响。通过市场分析、风险管理、财务策略等手段,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和应对经济风险,保持经营的稳定性和收益的持续性。

1.1.3 风险的特点

风险的特点是风险特有的一些特性,理解风险的特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风险管理理论的相关原理,有助于正确认识、识别风险。风险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客观性

客观性意味着风险是独立于人的意志和行为之外的,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受个人偏好、意愿或行为的影响,即使我们无法完全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它也依然存在,如地震、洪水、风暴等自然灾害,这种客观性意味着人们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措施来降低其发生的频率和影响程度,但无法完全控制。例如,日本位于太平洋火环带,地震频发,尽管有

着先进的预警系统和严格的建筑标准,但仍无法避免地震带来的损害。同时金融市场的波动也是客观存在的风险,它受到全球经济环境、政治事件、投资者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迅速蔓延至全球,导致股市暴跌,企业破产,就业市场萎缩。

2. 突发性

突发性是指风险往往没有明显预兆或在预期的时间之外突然发生,给人带来措手不及的冲击,如地震、火灾等。这种突发性使风险更加难以应对,增加了风险管理的难度。尽管风险事故的发生都有一个从渐变到质变的过程,但是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或者疏忽,往往并未注意到风险因素的渐变过程,致使风险事件的发生具有突然性,使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对。例如,2015年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由于危险品存储不当引发大火和连环爆炸,造成165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3. 损害性

损害性是指风险一旦发生,往往会带来损失,包括财产损失、人身伤亡和经济损失。如飓风、洪水等自然灾害不仅造成房屋、基础设施的损毁,还可能导致人员伤亡,对受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造成长期影响。例如,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新奥尔良,导致1800多人死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美元。另外,信息技术系统的故障,如银行系统崩溃、数据中心丢失数据等,不仅造成金融服务中断,还可能导致敏感信息泄露,对个人隐私和企业信誉造成损害。例如,2017年Equifax数据泄露事件,导致超过1.4亿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被盗,对公司声誉和消费者信任造成巨大打击。

4. 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指风险发生与否及发生的时间、地点、影响范围以及后果往往是不确定的,难以准确预测。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指的是某个风险事件在未来是否会发生是无法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本质特征之一,它使预测和预防风险变得更加困难。例如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具有突然性和随机性,尽管可以根据经济指标和市场动态进行一定的预测,但具体的发生时机和条件往往难以完全预见。

(2) 时间上的不确定性。时间上的不确定性指的是无法准确预测风险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点。这种不确定性使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和计划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地震的发生时间是高度不确定的,尽管科学家可以通过地质研究识别出某些地区存在地震风险,但预测具体何时发生地震仍然非常困难。另外以死亡风险为例,人总是面临死亡的风险,但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何时死亡是不可预知的。

(3) 地点上的不确定性。地点上的不确定性指的是无法准确预测风险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风险可以在任何地点发生,这使全面防范和应对风险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例如恐怖袭击的发生地点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恐怖分子可能基于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选择攻击目标,这使预测具体袭击地点变得极为困难。例如,世界各地的重要地标、交通枢纽、人群密集区等都可能成为袭击目标,但具体哪些地点会发生袭击难以预知。

(4) 影响范围及后果的不确定性。影响范围及后果的不确定性指的是无法准确预测

风险事件发生后的影响范围和可能造成的后果。这种不确定性使风险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即使防范了风险的发生,也可能面临不可预知的影响和损失。例如,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等,其影响范围可能涉及广泛地区,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具体的影响范围和后果往往难以在灾害发生前进行准确评估。因此,在风险管理中,需要充分考虑这种不确定性,并制订相应的应对措施来降低潜在影响。同时,对于已经发生的风险事件,及时采取措施减小与减轻其影响范围和后果也至关重要。

1.2 风险管理

1.2.1 风险管理的由来

风险管理作为现代管理科学重要理论之一,是在传统管理思想和现代科技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风险管理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人类活动时期,但是作为系统的科学管理,其诞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具体而言,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第一阶段: 早期风险管理

人类从很早就有了风险意识的萌芽。早期风险管理的主要体现是通过各种预防措施和互助互济的方式应对自然灾害与战争带来的影响。在远古时期,农业是社会的基础,但由于技术限制,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为了减小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古代中国建立了大型粮仓系统,用于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周期性洪水既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水源,也是巨大的威胁,当地人通过建造灌溉系统来引导和利用洪水,有效应对这一自然风险,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地区的安全。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力以劳人”,体现了原始的互助互济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战争和海盗活动频繁,商人们通过共同海损原则分摊航海贸易中的风险。

2. 第二阶段: 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

随着工业革命的诞生,企业风险管理的思想开始萌芽并逐渐发展。法国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在1916年的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首次将早期简单的风险管理思想运用于企业经营,标志着企业风险管理理论的诞生。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对保险的重视,企业风险管理开始向保险领域扩展。企业通过购买保险来转移风险,减少潜在的财务损失。同时,行业协会也逐渐意识到保险在企业管理中的特殊地位,开始推动企业进行风险管理。但此时,安全管理与保险的对象还只是危害性风险,并且这两个领域沟通不多。此外,工商企业购买保险的动机也并不完全是保障自身的利益,有的是出于人情的压力,或是由于想要向银行贷款等因素不得不购买保险。

1929—1933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许多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财富遭受巨大损失。这一事件使企业和个人都开始重视风险管理,思索如何减少和消除类似的灾难性后果。大量企业开始重视保险管理,设置保险机构,将风险管理推入经济学者们的研究范畴。193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所罗门·许布纳(Solomon Huebner)博士在美国管理协会会议上提出:“防患于未然就是最大的保险。”这一观点体

现了现代风险管理的重要理念。1931年,美国管理协会明确了风险管理的重大意义,并设立了保险部门作为该协会的独立机构。这一部门除了负责开展保险管理以外,还进行风险管理的研究和咨询。随后,1932年保险经纪人协会成立,开启了风险管理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代表着风险管理作为一门学科的起步。

3. 第三阶段: 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

在这一阶段,“风险管理”一词出现并且深受关注。风险管理的提出与企业的发展状况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20世纪40年代,很多大型企业中都设有保险经理专门负责保险的购买,但过分保险、不足保险和重复保险的问题日渐突出,至50年代初,企业已经明显感觉到当时的“保险型风险管理”不能满足现代企业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开始仔细地研究如何购买合适的保险,各个企业之间交换经验,进而发现了风险的存在,并进行评估与分析,以了解其性质以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选择最适当的方法以避免或消除风险。

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美国大公司发生的重大损失促使高层决策者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其中的一次工业灾难是1953年8月12日通用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州德佛尼的一个汽车变速箱工厂因火灾损失了5000万美元,它曾是美国历史上损失最为严重的15次重大火灾之一,将企业风险管理又推到了一个研究关注的新高度。

1955年,美国的“全国保险购买者协会”(NAIB)改名为“美国保险管理协会”(ASIM),这反映了业界对保险的态度转变。在学术界,也开始有学者呼吁企业中专门负责保险购买的部门应扩展为一个负责保险的购买与管理,并且还负责防损、工业安全和雇员福利计划的综合部门,而且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不应该被称为保险经理,而应称为风险经理。但当时“风险管理”这个概念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直到1956年,《哈佛经济评论》发表了拉塞尔·格拉尔(Russell Gallagher)的论文《风险管理—成本控制的新时期》之后,风险管理的概念才开始广为传播。1962年,美国管理协会出版了第一本关于风险管理的专著《风险管理之崛起》,进一步推动了风险管理的发展。随后,人们将风险管理作为专门学科进行系统性研究是以梅尔和赫奇斯(1963)的《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威廉姆斯、汉斯(1964)的《风险管理与保险》这两本书为标志的。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美国主要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都开设了风险管理课程。传统的保险系把教学重点转移到风险管理方面,保险仅作为一种风险筹资的工具加以研究,有的工商管理学院把保险系改名为风险管理和保险系。美国大多数大企业设置一个专职部门进行风险管理。虽然企业的人事部门单独或部分地管理雇员的福利计划,但就它处理社会保险金、养老金、医疗保险金、死亡和残疾的抚恤金等而言,这些仍属于风险管理的职能。同时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在无形中进一步推动了风险管理的普及。

4. 第四阶段: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以后,风险管理经历了从传统保险核心化向现代全方位风险管理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多个重要事件和组织成立促进了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美国、英国、日本等先后成立了专业的风险管理协会,这些协会将风险管理变为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1975年,风险与保险管理协会(RIMS)成立。1979年,国

际风险管理协会(IRMI)成立。1980年,美国风险分析协会(SRA)成立。这些协会成为不同学术团体交流思想的平台。其中,风险管理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标志是1983年RIMS提出“101条风险管理准则”。除了协会的成立,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的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开设风险管理课程,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学者也对风险管理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应用。例如,1984年台湾地区学者宋明哲先生出版了《风险管理》专著。1986年,新加坡召开了国际风险管理学术会议,标志着风险管理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1987年,美国学者Cooper和Chapman将风险分为技术风险与非技术风险,Tah和Carr在HRBS(层次风险分解结构)方法基础上发展的风险评估方法主要用于风险的定性分析,这些研究推动了风险管理的细化和深入。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大大提升了银行对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使全球金融机构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并在其内部管理和资本充足率标准中加以体现。

5.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系统性风险的概念逐渐引入,初步形成风险管理体系。企业中首次出现了首席风险官(CRO)的职务,这标志着风险管理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也意味着风险管理在企业内部的重要性日益提升,1991年,黑姆斯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新理念,进一步拓展了风险管理的内涵。这一理念强调风险管理应涵盖企业面临的所有风险,并采取综合措施进行管理。1993年,在中国香港地区,香港保险总会出版了第一本《风险管理》手册,为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中国内地在恢复保险业务后也开始重视风险管理的研究,并翻译和编写出版了数本教材,这些教材为企业提供了风险管理的知识和工具。1999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充分吸纳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推动全面风险管理不断普及和发展,该协议对银行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体系建设。2004年,美国全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的发起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COSO)首次提出了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把全面风险管理提升到新高度。该框架为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提供了指导,强调风险管理应融入企业日常运营中。2005年,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IRGC)发布了《风险治理白皮书——面向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系统提出了风险治理的研究框架,为企业和政府组织提供了风险治理的指导原则与实施方案。2006年1月6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技能鉴定中心批准,风险管理师职业资格认证管理委员会(CCRM)在北京成立。同年12月10日,举行了首届风险管理师认证考试,标志着我国风险管理事业进入正规化阶段。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制定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强调了风险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提出了风险评估、风险策略、风险监管及预警流程等关键组成部分,明确了风险管理的目标、原则和方法。该指引的发布,标志着我国中央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了明确的执行标准和指导方针,促进了风险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系统化。2009年,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风险管理——原则与指南》(ISO 31000:2009)、《风险管理——术语》(ISO Guide 73:2009)、《风险管理——风险评估技术》(ISO/IEC 31010:2009)等一系列风险管理标准,这些标准为全面实现风险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指引。随着风险管理实践不断发展,ISO对原有的风险管理标准进行了更新,如《风险管理——指南》(ISO 31000:2018)和《风险管理》(ISO 31000:2018),

以及针对特定领域的风险管理标准《风险管理—生命周期过程—系统和软件工程》(ISO/IEC/IEEE 16085: 2021)。这些更新的标准进一步完善了风险管理的体系,使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技术环境,为多领域的风险管理提供了更为具体和专业的指导。此外,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8年改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也发布了《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GB/T 27921—2011)、《风险管理 术语》(GB/T 23694—2013)^①以及《风险管理 指南》(GB/T 24353—2022)等一系列标准文件。这些文件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的风险管理逐步进入标准化和体系化,为我国企业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风险管理方法和工具。

1.2.2 风险管理的概念

1. 风险管理的内涵

风险管理起源于保险业,并逐渐发展到金融领域、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等领域。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险管理被引入应急管理领域,成为应急管理重要的手段。同时,风险管理也作为研究风险发生规律和风险控制技术的一门新兴管理科学。詹姆斯·克里斯蒂(James Christie)将风险管理定义为组织为控制偶然损失的风险,以保全获利能力和资产所做的一切努力。亚瑟·威廉姆斯(Arthur Williams)和理查德·汉斯(Richard Heins)则将风险管理定义为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和控制,以最低的成本使风险所致的各种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的管理方法。所谓风险管理是指通过系统的方法识别、评价和控制风险等过程,以减小风险对组织、企业或项目目标的负面影响。风险管理的一般过程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调整等。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是开展有效风险管理重要的第一步,因为人们只有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情境,才能去考虑如何对其进行管理。

由于风险管理的应用极为广泛,而各个学科领域中管理的目标也不尽相同,所以对风险管理的界定如同对风险的界定,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在公共管理学中,风险管理通常关注政府或公共机构如何识别、评估、管理和监控可能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的风险。这包括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社会动荡等风险。经济学中的风险管理主要指通过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来识别、评价和控制或规避风险,以最大化经济效益。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风险管理,重点在于识别并减少社会问题和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即如何感知风险、如何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沟通风险信息,以及如何通过社会规范和制度来控制风险。政治学中的风险管理关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风险评估和管理,包括国家安全、国际关系、政治稳定等领域的风险管理。虽然不同学科领域的风险管理各有侧重点,但共同目标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最大限度地降低潜在风险对组织、社会和经济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风险管理的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1) 风险管理主体多元。风险管理的主体可以是个人、家庭和企业,也可以是政府、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甚至包括跨国集团和国际联合组织等。虽然风险管理主体不一,但所依据的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却是相同的,都是寻求以最低的管理成本获得最

^① GB/T 27921—2011《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和 GB/T 23694—2013《风险管理 术语》这两个标准已失效,被 GB/T 27921—2023 和 GB/T 23694—2024 替代。

佳的处理风险事故的方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风险管理的主体不同,风险管理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个人、家庭的风险管理主要是对人身风险、家庭财产风险和责任风险的管理;企业的风险管理涉及企业生产风险、销售风险、财务风险、技术风险、信用风险和人事风险的管理;政府的风险管理是以维护政府机构业务活动和人民生活安定为出发点的,是对整个社会生命、财产和责任风险的管理。风险管理主体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降低潜在的损失,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 风险管理的核心是减少损失。减少损失,即在风险事故发生前防患于未然,预见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失,或者在风险事故发生后,采取一系列消除事故隐患和减少损失的办法。从风险管理的流程看,风险管理的每个环节都是为了减少损失。风险识别是为了减少风险事故的发生;风险评估在于明确哪些风险应被优先处理,哪些可以接受,通过量化分析和定性分析,确定风险的严重程度,并据此分配资源,确保重点解决那些影响最大、可能性最高的风险;风险控制在于通过适当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小风险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风险调整确保风险管理措施持续有效,并能灵活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3) 风险管理的对象可以是纯粹风险,也可以是投机风险。传统风险管理的对象侧重于纯粹风险,即那些只可能带来损失的风险,如自然灾害、意外伤害等。然而,一些专家认为,风险管理不仅应该包括纯粹风险,而且应该包括投机风险,即那些既有可能带来损失也有可能带来收益的风险。这是因为,尽管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缺乏适当的标准将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区分开来。此外,随着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投机风险(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对组织的影响日益增大。现代风险管理不仅关注纯粹风险,也开始关注投机风险,尤其是在银行、保险和证券投资等领域的金融风险。例如巴林银行的期货投机导致破产、澳大利亚维斯特派克公司的坏账注销等事件,都凸显了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强调了即使是投机风险也需要被积极管理,以避免巨大的财务损失和提升企业的可持续性。现代风险管理要求组织对所有类型的风险进行管理,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种风险。这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紧密协作,比如财务部门、运营部门、法务部门等共同参与风险管理过程。总之,不管引发损失事件的原因如何,风险管理已经越来越重视对投机风险的管理,风险管理的对象已经扩展到了投机风险。

(4) 风险管理过程是决策的过程。风险管理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决策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一系列步骤来识别、评估和应对风险,从而帮助组织在不确定性中作出更好的决策。其中风险识别、风险衡量和风险评价是为了认识、评价风险管理单位的风险状况,解决风险管理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制订管理风险的决策方案。风险控制涉及选择最合适的风险应对策略,以及如何平衡成本和效益,确保措施的实施不会超出组织的资源和能力范围。

2. 风险管理的特点

1) 全面性

风险管理是一项全面性的管理。风险管理的具体内容反映了风险管理主体对风险因素、风险源(sources of risk)和损失不确定性的识别、评估与管理决策。如果风险管理主体对风险的认识、处理缺乏全面性,只处理某一方面的风险隐患,而不考虑其他方面的风险隐患,其风险管理的决策就有可能失败。因此,风险管理不仅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涉

及财务、安全、生产、技术等多个方面,形成一个全面的管理方案。它要求识别和评估所有可能的风险来源,包括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例如,在项目风险管理中,需要识别项目内部的潜在风险(如成本估算、人事任免),以及外部风险(如市场变化、政府行为等)。

2) 系统性

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调整等环节。这些步骤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循环。例如,风险识别是基础,为后续的评估和控制提供信息;而风险调整则通过动态调整风险管理措施,确保其适应环境的变化。

3) 动态性

由于环境和组织目标的变化,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新的风险可能随时出现,已有风险的性质和影响也可能发生变化,因此需要不断调整和更新风险管理计划。例如,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带来新的安全风险,组织需要及时识别并制订相应的应对措施。

4) 广泛性

风险管理是涉及许多领域的管理,风险管理的范围不仅会涉及人们可预测的范围,而且会涉及人们无法预期的领域。一个单独的事件可以同时影响社会的不同领域,而且其后果会远远超出当时影响的范围。风险的复杂性和普遍性决定了风险管理是十分广泛的,风险管理学是涉及多门学科的交叉学科。例如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会涉及会计、法律、金融等多门学科,这些都使风险管理研究变得更加广泛。

3. 风险管理的原则

为保证风险管理的效率,依据国家标准文件《风险管理 指南》(GB/T 24353—2022)中对风险管理原则的规定,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1) 融入性。风险管理是组织所有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融入组织的各项管理活动之中。

(2) 信息和决策支持。风险管理应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支持组织的决策过程。

(3) 定制化。根据组织的目标和内外环境,定制设计风险管理框架和过程。

(4) 环境依赖。风险管理受人文因素的影响,且取决于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和组织所承担的风险。

(5) 广泛参与、充分沟通。风险管理过程中,及时组织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的沟通,是确保风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前提。尤其是确保重大风险事件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时,利益相关者间持续、双向和及时的沟通极为关键。

(6) 持续改进。风险管理是一个循环提升的过程,需要不断进行学习和实践,持续改进风险管理。随着内外环境、组织所处环境、认知的改变以及监督检查的开展等,风险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可能消失或转变成新的风险等。因此,风险管理单位也应该在动态管理的过程中保持对变化的敏锐感知,并及时作出反应,保证风险管理的持续改进。

1.2.3 风险管理的作用

风险管理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企业经营、金融投资、项目管理,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减少损失、保护利益上,还涉及提高效率、促进决策、满足合规要求等多个方面。以下是对风险管理作用

的详细阐述。

1. 预防风险事故的发生

风险管理的核心目的之一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通过对潜在风险的识别和评估,风险管理主体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或减轻这些风险的影响。例如,金融公司通过建立强大的信用评估体系,可以有效预防因客户违约而带来的财务损失。

2. 减少风险事故造成的损失

风险管理通过提前识别那些可能导致重大损失的风险,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从而减少组织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可能遭受的损失。同时其也可以使风险管理主体充分认识到自身所面临风险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并采取相关的风险管理技术,以减少风险事故造成的损失。

3. 提高决策质量

风险管理为风险管理主体提供了关于潜在风险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是作出明智决策的基础。决策者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评估不同选择方案下的风险和收益,从而作出更加合理的选择。例如,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通过风险管理,团队能够识别和评估与产品相关的技术及市场风险,从而决定是否继续投资或是调整产品方向。

4. 提高运营效率

风险管理有助于优化资源分配。通过明确哪些领域的风险较高,组织可以将资源重点投入这些领域,以降低整体风险水平。这种资源的合理分配可以提高组织的整体运营效率。例如,一家全球化公司可能会发现某些地区的政策变动风险较高,因此决定在这些地区增加法律咨询投入,以确保合规并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

5. 满足合规要求

在某些行业或领域,建立风险管理制度是符合法律法规、行业标准以及监管要求的基本要求。通过建立适当的风险管理制度,可以降低违规风险,维护组织或个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在金融行业中,金融机构需要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制度来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和合规经营。

6. 促进可持续发展

风险管理有助于组织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通过持续监控和管理风险,组织可以预防那些威胁其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问題。例如,能源公司通过评估环境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减缓措施,如投资清洁能源技术,不仅能够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够应对未来可能出台的碳税政策,从而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1.2.4 相关概念辨析

1. 风险管理与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起源于欧美。1915年,莱特纳在《企业风险论》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管理;1921年,马歇尔在《企业管理》中也提出了危机的处理方法;但“危机管理”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尚未形成。1962年,随着古巴危机的爆发,美国学者正式提出了“危机管理”的概念。这一时期,危机管理主要关注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目的是防止冲突升级为战争。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多和全球化的推进,危机管理的范

围逐渐扩大。它不仅限于军事领域,还涉及了环境、资源、灾害、恐怖事件等多个方面。这一时期,危机管理开始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国家或城市管理新理念,旨在应对各种复杂的危机情况。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兴起,危机管理理论被引入企业管理领域。美国企业界开始在企业内部成功运用危机管理方法,提高了企业对危机的应对能力。这一转变标志着危机管理理论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应用。20世纪后期至今,危机管理的研究和应用范围继续扩大,不仅限于生产和商业领域中的技术危机与商业危机,还更多地表现出其公共危机的属性。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危机管理呈现出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过渡的趋向。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等公共部门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危机管理是指在危机发生后,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充分应对危机,尽可能减小或控制危机的影响和损失的过程。格林(Green)于1992年指出,危机管理的一个特征是“事态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认为危机管理的任务是尽可能控制事态,在危机事件中把损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事态失控后争取重新控制住。菲利普·亨斯洛(Philip Henslowe)认为,危机管理是“对任何可能危害组织的紧急情境的处理能力”,其主要观点侧重于组织发生危机时对危机的处理能力。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认为,危机管理是指“对危机事前、事中、事后所有方面的管理”,是随着危机越来越多而必须对其处理而产生的科学。总的来说,它更侧重于危机发生后的应对和处理。而风险管理主要是预防风险实际发生,或者将其影响降至最低,它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识别、评估和控制潜在风险来避免损失。

因此,风险管理注重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并通过预先制订的应对措施来降低其可能性。危机管理则强调危机发生后的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确保组织能够迅速从危机中恢复。虽然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的侧重点不一样,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风险管理是危机管理的预防阶段,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和影响程度;而危机管理则是风险管理的延伸和补充,当风险管理无法完全避免危机发生时,危机管理将发挥重要作用,以控制危机的影响并恢复组织的正常运营。

2. 风险管理与应急管理

应急管理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在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过程中,通过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应用科学、技术、规划与管理等手段,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有关活动。应急管理强调的是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和有效处置。其中突发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事故灾难风险管理、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管理和社会安全事件风险管理四个方面。应急管理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损失且尽可能地预防事件扩大或者再次发生。然而,风险管理的对象是“风险”,即发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它关注的是风险本身的产生原因、概率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通过采取有效手段来防止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

风险管理与应急管理在逻辑上是紧密相连的。风险管理是应急管理的基础,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评估和控制,为应急管理提供前期准备和决策依据。而应急管理则是在风险事件发生后,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和减轻风险带来的后果。两者都旨在保护公众生命、

健康和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它们通过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维护社会稳定。

然而两者也有一定的区别:一是管理对象不同。风险管理的对象是“风险”,应急管理的对象是“突发事件”。二是管理阶段不同。风险管理贯穿项目或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监控等阶段。它强调的是在事件发生之前进行预防和控制,力求将风险降至最低。应急管理主要关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对和处置阶段,包括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应急恢复等过程。它强调的是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来减轻损失和恢复秩序。三是管理重点不同。风险管理重点在于对风险的全面分析和控制,通过制定风险管理策略和计划,来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它强调的是对风险的预见性和前瞻性管理。应急管理重点在于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和有效处置,通过建立健全的应急管理体系和机制,来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效率。它强调的是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和恢复能力。四是管理手段不同。风险管理主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如风险识别技术、风险评估模型、风险控制策略等,来进行风险分析和控制。应急管理则更多地依赖于应急预案、应急演练、应急资源调配等手段,来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序地进行应对和处置。

基于此,风险管理与应急管理在公共安全管理中各具特色、相互补充。风险管理为应急管理提供了前期准备和决策依据,而应急管理则是风险管理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具体体现和延伸。两者共同构成了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 风险管理理论

1.3.1 脆弱性理论

1. 脆弱性

1) 脆弱性理论的发展历程

“脆弱性”一词来自拉丁文 *vulnerare*,意思是“可能受伤”。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脆弱性研究的雏形就已经出现在自然灾害的研究之中,相关学者针对同样的灾害对不同的人群造成损失不同展开讨论。救援组织将对灾难的脆弱性研究应用到实际的救援活动中,试图提高救援效率,减少救援需求。脆弱性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忽视了政治、结构性等因素,以工程学为主的脆弱性研究比较局限。20世纪70年代,吉尔伯特·F.怀特(Gilbert F. White)首次提出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概念。之后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生态学、金融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许多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脆弱性研究逐步成为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热点与前沿领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灾害研究由致灾因子论向脆弱性研究转移,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灾难产生的社会经济系统。由于自然系统的许多规律并没有为人类所认识,加之许多致灾因子并不能为人类所控制和左右,脆弱性理论在人类防灾、减灾实践中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粮食安全研究领域开展了贫困脆弱性研究,从个体出发分析福利与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并应用于扶贫实践,促进贫困援助事业的发展。2000年以

来,脆弱性研究把灾害学中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方法,特别是风险度、敏感性等内容,与政治学中的社会因素、人文因素、制度因素等相结合,着手研究耦合系统脆弱性机制及过程的产生,并将脆弱性作为系统的一个重要属性正式提出。2004年,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首次正式将脆弱性定义为“是由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及过程共同决定的系统对各种胁迫的易损性,为系统的内在属性”。当前,随着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等技术的发展,智能系统的脆弱性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智能系统的复杂性、跨域交互特性等带来了新的脆弱性挑战,促使研究者们探索新的检测、分析和防御方法。

在国外的灾害脆弱性文献中,常常针对具体的灾害种类,将人群承灾体根据收入分为富人、中等收入的人、穷人,或根据不同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划分出脆弱性不同的人群,定性分析这些人在灾害中所受灾害的程度与反应及当地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化、市场体系等对这些人的影响。对于环境、财产与资源的脆弱性,则从其自身抗灾特性分析。脆弱性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应用,其概念也得到了不同层次的扩充。国内的脆弱性研究起步稍晚,但发展迅速。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并引入脆弱性理论,逐步将其应用于自然灾害管理、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等领域。进入21世纪,脆弱性研究在国内逐渐形成独立的科学体系,并在多个学科间交叉融合。

2) 脆弱性的概念

脆弱性的概念提出以来,关于脆弱性的研究就活跃在多个学科领域,例如生态学、气候学、灾害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金融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按照研究领域的不同,脆弱性的概念和研究对象见表1-1。

表 1-1 脆弱性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领 域	概 念	研 究 对 象
生态学	生态系统在面临外界扰动(如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时的敏感性和恢复能力	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稳定性及其对外部扰动的响应机制
气候学	系统(如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对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	气候变化对农业、水资源、人类健康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适应和减缓措施来降低这种脆弱性
灾害学	强调社会经济系统在受到灾害影响时的抗御、应对和恢复能力,侧重灾害脆弱性产生的人为因素	特定承灾体(如城市、社区、人群等)在面临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台风等)时的脆弱性表现及其影响因素
金融学	金融系统在面对市场波动、金融危机或其他经济冲击时的不稳定性。这涉及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等方面	银行系统、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或重大经济变动时的脆弱性表现
经济学	经济体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由于其内在结构和政策不足而容易遭受的损失。这涉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等方面	国家在面对全球经济衰退、贸易冲突和其他国际经济动荡时的脆弱性表现
社会学	社会群体在面对社会变革、政治动荡或经济危机时的敏感性和应对能力	贫困社区、弱势群体和边缘化人群在面对社会不平等、歧视和剥夺时的脆弱性表现

所谓脆弱性,主要是指人或事物相对于致灾因子的易损性。Gabor 和 Griffith(1980)基于社区脆弱性评估,认为脆弱性是遭受损害的可能性。Timmerman(1981)基于社会系统脆弱与弹性,认为脆弱性是产生不利响应的程度。George(1998)基于沿海地区风暴灾害的研究,认为脆弱性是自然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的综合度量,由暴露、抵抗力、恢复力三部分组成。Brenkert(2005)从气候灾害角度认为脆弱性应该从气候的敏感性、社会应对能力、适应能力三方面进行分析。另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脆弱性是指对危险暴露程度及其敏感性和抵抗力尺度的考量,脆弱性的概念已经逐渐演变成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相关概念在内的一个概念集合,内涵不断丰富。学术界对脆弱性研究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2001年4月《科学》杂志发表的《可持续性科学》(“Sustainability Science”)一文把“特殊地区的自然—社会系统的脆弱性或恢复力”研究列为可持续性科学的7个核心问题之一。通过性质分类,脆弱性包括物理脆弱性、社会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环境脆弱性。具体而言,它们的含义如下。

(1) 物理脆弱性: 主要指物理结构或系统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抵抗能力和恢复能力。例如,建筑物的抗震能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供水系统等)在灾害中的稳定性以及它们灾后的恢复速度等,都是物理脆弱性的体现。

(2) 社会脆弱性: 关注社会群体在面对灾害或危机时的适应能力、组织能力和社会支持系统的有效性。这包括人口结构、社会网络、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文化习俗以及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应急响应能力等。社会脆弱性高的地区往往更容易受到灾害的影响,且恢复过程更加艰难。

(3) 经济脆弱性: 指经济体系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稳定性和恢复能力。这包括经济结构、产业布局、财政状况、金融稳定性以及国际贸易关系等方面。经济脆弱性高的地区往往更容易受到经济危机、市场波动或自然灾害等冲击的影响,导致经济下滑和社会动荡。

(4) 环境脆弱性: 关注自然环境在面临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干扰时的敏感性和恢复能力。这包括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水资源状况、土壤质量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环境脆弱性高的地区更容易受到环境退化的影响,如荒漠化、水土流失、污染加剧等,进而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2. 脆弱性理论模型

1) 风险与灾害模型

风险与灾害(risk and hazard)模型又称 RH 模型。该模型以 Burton 等为代表,认为区域自然灾害是致灾事件与人类相互作用的产物,把致灾因子造成的破坏理解为暴露度和承灾体敏感性的函数,将脆弱性界定为人们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程度,表示为自然灾害强度与损失程度之间的关系。2002年,Burton 等拓展了风险与灾害模型,他们在模型中纳入了多重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他们运用新的风险与灾害模型分析了城镇化、经济一体化、生态变化、气候变化等各种因素对个人、区域甚至国家脆弱性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学者提出应对自然灾害的根本出路是人类对灾害的适应与调整。应用该模型对灾害或气候变化影响进行评价时,强调承灾体对致灾因子或环境冲击的暴露性和敏感性,关注的焦点是导致灾害的具体原因和后果,不

重视社会结构、制度在不同的承灾体暴露程度和灾害后果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未考虑承灾体对灾害结果所产生的放大或缩小影响以及具体发挥作用的途径。

2) BBC 模型

BBC 模型因包加迪(Bogardi)、比克曼(Birkmann)和卡多纳(Cardona)三位学者的提出与发展而得名。该模型从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层面对脆弱性进行分析,暴露在脆弱性状态下的不同层面应对能力不足,导致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该模型将风险应对和脆弱性降低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风险或灾难发生前,通过预警和准备对环境、社会与经济进行系统干预,从而避免灾害事件的发生;二是风险或灾难发生后,通过灾难响应和突发事件管理减少脆弱性后果。同时,该模型指出脆弱性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该过程由脆弱性的产生、降低脆弱性的举措、促进系统恢复等若干步骤组成。

3) MOVE 模型

MOVE 模型由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提出。该模型旨在建立一个脆弱性多元特征的综合概念模型,从物理、社会、生态、经济、文化和制度等多个维度评估环境变化的影响,如解释暴露、敏感性、社会响应能力与适应能力等核心因素。MOVE 模型中的风险不仅来源于自然环境,还包括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与社会系统的交互作用,而脆弱性的多元化特征主要与社会条件和过程相关。该模型强调脆弱性是动态的过程,具有非线性和尺度特征,因此,该模型的应用必须考虑影响脆弱性的地方特征及其社会和环境系统的构成因素与耦合过程。虽然 MOVE 模型没有提供具体的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但为社会脆弱性的系统评估提供了指导,主要应用在灾害管理、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等状态下的社会脆弱性问题。

4) 压力与释放模型

压力与释放(pressure and release)模型,又称 PAR 模型。该模型以 Blaikie 等为代表,从形成灾害的根源上分析了脆弱性的形成机理。压力与释放模型把灾害的发生描述为压力产生和作用的过程,认为灾害是在压力和致灾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而脆弱性是这种压力的释放。其中,“压力”(pressure)是指产生脆弱性的自然灾害事件过程,“释放”(release)是指灾害、压力与脆弱性的减弱。PAR 模型从压力释放角度提出,对灾害的缩减应该通过缓解压力的方式。一方面从根源上减轻压力,如合理分配资源,观念的转变研究与开发的推动等;另一方面从致灾事件的掌控上缓解压力。该模型详细阐述了社会因子这一根源是如何经过“动态压力”和“不安全条件”两个阶段逐渐产生脆弱性的动态过程。同时,该模型认为社会经济和人群特征对灾害脆弱性有决定性的意义。

5) 区域灾害模型

区域灾害(hazards of place)模型,又称 HOP 模型(图 1-1),是苏珊·L.卡特(Susan L. Cutter)于 1996 年提出的,其认为脆弱性科学应建立在地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之上,以更全面地理解脆弱性的形成机制。该模型目的在于考察脆弱性在区域空间上的差异并试图解释自然灾害与社会脆弱耦合作用下可能导致的区域脆弱性问题。具体而言,在 HOP 模型中,风险与减灾(mitigation)交互作用形成潜在的致灾因子,通过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形成物理脆弱性与社会脆弱性,而物理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的相互作

用又形成区域脆弱性,从而把自然灾害本身所具有的地理区域特征与社会脆弱性研究中的恢复力、应对能力等结合起来,避免了以往脆弱性研究中只关注自然或人文系统脆弱性的弊端,使脆弱性研究向着耦合系统的方向发展。HOP模型提出后,许多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通过分析特定地方的多种风险或多种压力来探讨人口和社会的脆弱性,这些研究明确了风险暴露度和社会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对于确定风险事件特征和脆弱人群的识别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对地方和区域尺度制订风险干预与减缓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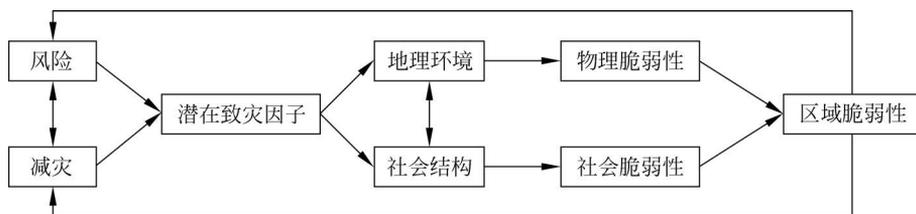


图 1-1 HOP 模型

资料来源:杨俊,向华丽.基于 HOP 模型的地质灾害区域脆弱性研究——以湖北省宜昌地区为例[J].灾害学,2014,29(3):131-138.

6) 三角模型

“三角模型”是迈克尔·J.沃茨(Michael J. Watts)和沃斯·G.博勒(Hans G. Bohle)在研究粮食安全领域中的饥饿、饥荒与贫困之间的结构关系时,从人类生态学、权利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三个方面构建的食物安全脆弱性理论模型。在人类生态学中,粮食安全脆弱性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如过度开垦、污染等,可能破坏生态系统,加剧粮食安全脆弱性。在权利理论视角下,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以及个体或群体在获取食物资源时的权利和能力受到关注。权利不平等是导致饥饿和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个视角下,粮食安全脆弱性不仅取决于食物的物理可获得性,还取决于人们是否有能力获取这些食物,这涉及社会制度、政策、文化习俗以及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等多个方面。在政治经济学中,强调政策、市场和经济制度如何影响食物生产与分配。总的来说,该模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权利的具体分配以及在特定环境下是如何产生的;②权利的集合;③政治经济的结构特征(会产生权利危机)。该模型从脆弱性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体制角度进行分析,揭示了脆弱性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但是没有考虑自然环境变化对粮食安全产生的影响。

7) “钻石模型”

R. Chambers 认为脆弱性应该包括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外部是指系统所暴露的扰动和压力,内部是指系统对外部压力和扰动的响应及恢复力。博勒认同 R. Chambers 对脆弱性的划分方法,但是他认为以往的研究比较关注脆弱性外部方面的分析,对脆弱性内部方面的研究不足,尤其是在概念和理论方面。他认为应对能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提出与应对策略关系最为紧密的三种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一是对脆弱性内外两个方面相互作用及其辩证关系的研究,即外部因素如自然灾害、经济波动等可能对系统造成压力,而内部因素如应对能力、资源分配等则决定了系统对这些外部压力的敏感性和恢复力。二是对应对资源使用权的研究,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

用效率,是降低脆弱性、增强系统韧性的关键。三是冲突和危机理论,即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时,系统内部可能产生各种冲突和危机,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是模型关注的重点之一。在吸收 R. Chambers 观点的基础上,博勒创建了脆弱性分析的“钻石模型”,该模型将上述三个研究方向与权利理论、人类生态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概念及理论融入脆弱性分析中,促进了脆弱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8) AHV 模型

AHV(Airlie House Vulnerability)模型(图 1-2)以 B. L. 特纳(B. L. Turner)、卡斯珀森(Kasperson)等为代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为脆弱性是由“人类—环境”耦合系统决定的,并且这种关系存在于任何尺度上的耦合系统。该模型由以下三个层次构成:一是耦合系统中的人文条件与环境条件;二是人文、环境条件及其相互作用过程中面临的扰动或压力;三是表征耦合系统脆弱性的暴露、脆弱性和恢复力。各层次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存在于不同尺度上(地方、区域和世界)的耦合系统,系统的人文—环境条件决定其暴露度和脆弱性,并影响系统的应对机制。在该模型中,人类与自然环境的脆弱性是相互联系的,系统的脆弱性具有动态性,并且随着时间、地域和社会空间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具有地方特性。AHV 模型已应用于多个资源型城市的脆弱性分析项目,如中国部分煤炭城市、石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这些应用展示了 AHV 模型在不同经济背景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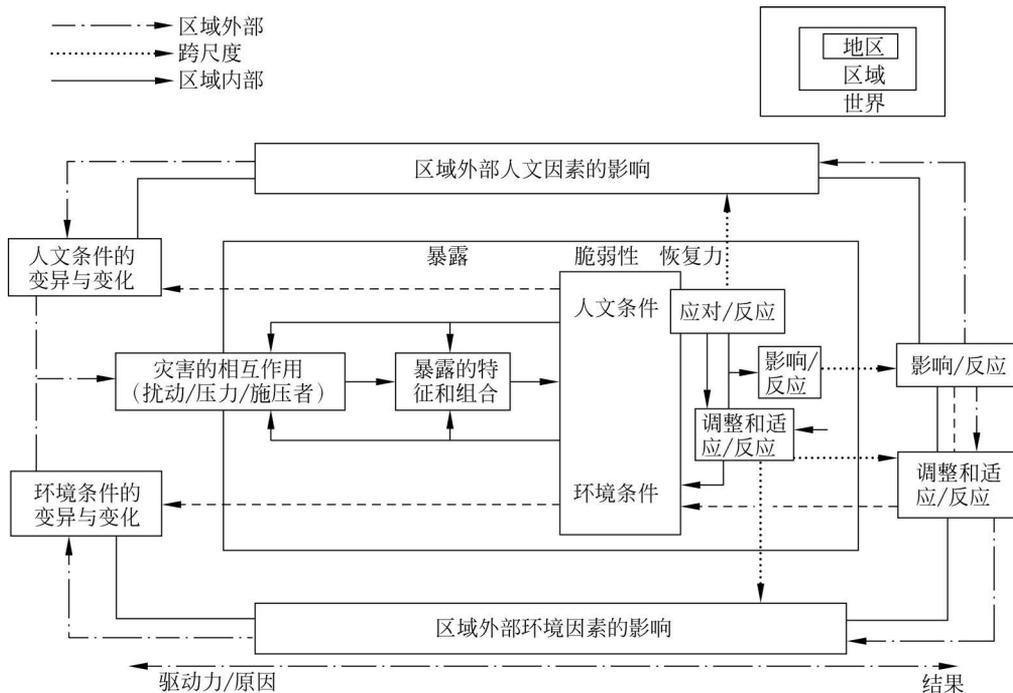


图 1-2 AHV 模型

资料来源:徐君,李贵芳.资源型城市脆弱性的 AHV 模型及演化耦合作用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7,33(8):899-904.

9) 可持续生计模型

可持续生计模型是一个用于评估和指导贫困减贫策略与可持续发展计划的理论框架,它通过综合分析个人或家庭的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来制定提升生计持续性的策略。这些资本共同影响个人或家庭在面对经济和环境变化时的适应能力与恢复力。其中人力资本指人们为了追求不同的生计策略和实现生计目标而拥有的技能、知识、劳动能力和健康等,这些能力直接影响个人的工作效率和收入水平。自然资本包括人们的生计所依靠的自然资源的储存和流动,如生物多样性、可直接利用的资源(如土地、树木等)以及生态服务。物质资本指维持生计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以及生产用具,例如住房、交通工具和生产设备。金融资本主要指流动资金、储备资金以及容易变现的等价物,这些资金为生计活动提供经济支持。社会资本指各种社会资源,如社会关系网和社会组织(宗教组织、亲朋好友和家族等),包括垂直的(与上级或领导的关系)社会联系和横向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社会联系。可持续生计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脆弱性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的社会与贫困脆弱性、家庭生计安全等,其主要贡献之一是为社会脆弱性评价提供了指标来源。

上述脆弱性理论的典型模型,为脆弱性的理论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脆弱性评估与实证分析提供了指导。脆弱性的理论模型是对脆弱性产生原因及机理的概念化表述,每个模型都试图找出脆弱性形成的根本原因,从不同角度探索脆弱性驱动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但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不同模型的脆弱性研究出发点、逻辑思路和主要内容有很大不同。由于不同学科领域自身对脆弱性内涵的理解及研究方向具有显著差异,这些脆弱性理论模型具有不同的特色。例如,RH模型认为区域自然灾害是致灾事件与人类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PAR模型旨在从灾害形成的根源上探讨脆弱性的形成机理;HOP模型基于空间分析,强调地理位置对脆弱性的影响。可持续生计模型用于评估和指导贫困减贫策略与可持续发展计划,主要集中于个体和家庭的尺度上,从人的谋生能力和消除贫困的角度分析脆弱性,脆弱性被解释为谋生能力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以及不能维持生计。

3. 脆弱性评估方法

脆弱性评估方法是用于评估和分析个体、群体或系统在面对各种压力与扰动时所显示的易损性及恢复力的工具。这些方法涵盖了从自然灾害到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为降低脆弱性并提高可持续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目前学界主要运用的脆弱性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评估框架

C. Polsky 等受美国公共空间计划(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整合框架的启示,把脆弱性分解为“暴露、敏感、适应”三个组成部分,使用 VSD 评估框架来组织数据、统一概念和构建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网。图 1-3 展示了运用 VSD 评估框架进行脆弱性评价的流程,可以看出整个过程包括整合、分析、VSD 评估框架三个系列。VSD 模型的一般形式为,模式中心为脆弱性,外层是维度层,由暴露、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构成;在具体的评价中指标和参数层逐级细化。由中心层、维度层、指标层和参数层逐级构建了分析框架,指标和参数的选择根据具体评价对象与研究目的而定。VSD 评估框架的优势在于:一是具

有明确的含义,将脆弱性分解为暴露、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三个维度;二是用维度层—指标层—参数层逐级递进、细化的方式来组织评价数据;三是有规范评价流程的八个步骤。VSD 评估框架具有较好的兼容性,明晰的评价流程可以系统指导从数据整理到结果应用的全过程。该框架提供了一个系统地进行脆弱性分析和评价的基本思路,囊括了从抽象的定性分析到具体的指标和参数选取的全过程,在数据理想的情况下,作为脆弱性评价的实践指导,其圈层式的数据组织框架具备良好的延展性,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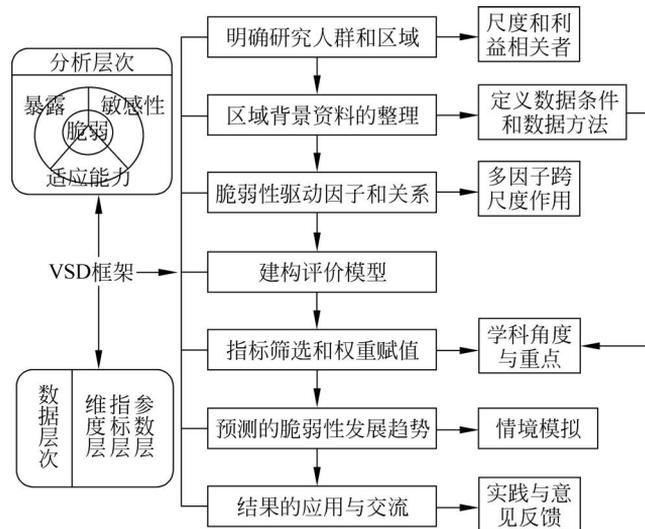


图 1-3 VSD 评估框架

资料来源:刘小茜,王仰麟,彭建.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进展[J].地球科学进展,2009,24(8):917-927.

2) ADV(agents'differential vulnerability)评估框架

随着脆弱性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重视人在脆弱性评估中的作用。作为受到自然和社会经济变化影响的人类的发展需求以及对适应方式的选择等因素被纳入脆弱性评价体系之中。Acosta-Michlik 等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交互式脆弱性评估框架”,即 ADV 评估框架(图 1-4)。该框架更能体现将脆弱性形成的时间和空间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及包括气候变化与全球化过程在内的多种全球变化过程结合起来的脆弱性评价理念,并且提出要将大多数研究中的一般性指标评价方法转变为面向适应者的脆弱性评价。作为适应者的脆弱性不仅是暴露水平、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而且包括适应者对变化和风险的认知过程,如对变化及风险的感知、评估,是对适应方式的权衡与选择、决策过程以及对自身适应行为产生效果的评价等诸多过程。这些过程更好地涉及各种经济、社会和行为科学理论,不同的风险承担者会有不同的认知策略。但由于人们感知的脆弱性很难度量,该框架的实用性还值得进一步检验。

3) 综合指数法

综合指数法通过对选取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主成分分析、综合加权求和、熵权系数、层次分析等方法确定指标权重,进而综合评价脆弱性程度。该方法计算过程相对简单且容易操作,但在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缺乏指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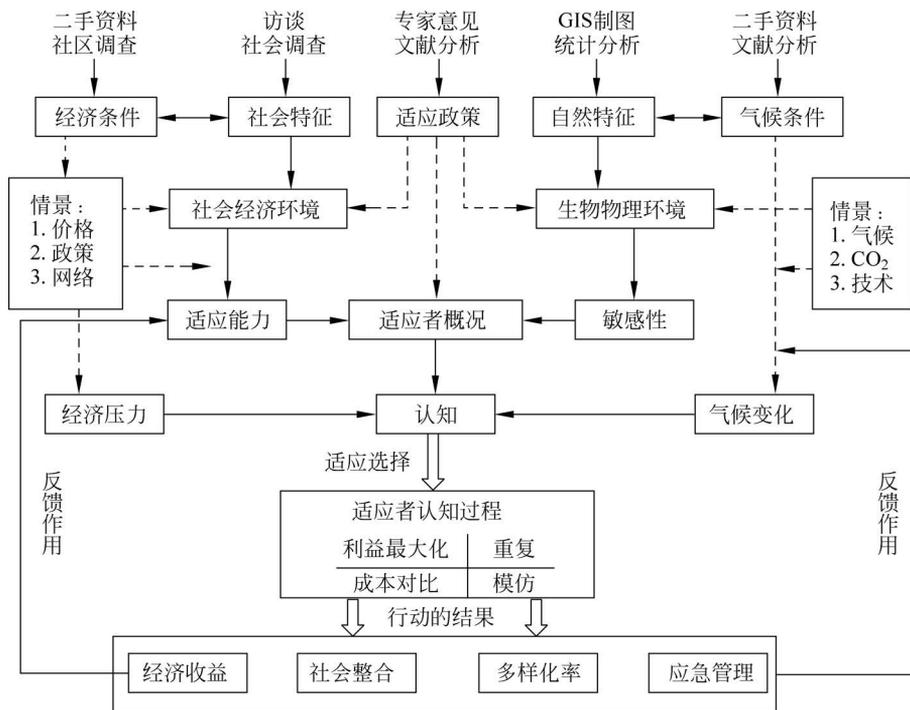


图 1-4 ADV 评估框架

资料来源：黄建毅,刘毅,马丽,等. 国外脆弱性理论模型与评估框架研究评述[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1(5): 1-5,15.

间相关关系的体现。例如,何黎(2015)采用了综合指数法来评估成都市的生态环境脆弱性,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三个方面选取了人口密度、城市建设用地占比、工业产值占 GDP 比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财政环保支出比重、财政教育支出比重、污水处理率等 16 个具体指标,通过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出成都市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综合指数。结果显示,成都市生态环境脆弱性总体处于“低度脆弱”,但脆弱性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2007 年综合指数值最低,为 0.222;2015 年综合指数值最高,为 0.301。

4) 函数模型法

函数模型法是一种常用的分析方法,用于量化并评估系统或对象在面临特定风险或压力时的脆弱性。这种方法通常将脆弱性分解为多个维度,如暴露度、敏感性、应对或适应能力以及恢复力等,以构建相应的脆弱性函数模型。该方法较好地明确了脆弱性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量化反映要素权重,但如何确定要素仍存在困难,且表现形式差异较大。例如对某沿海地区社区进行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考虑海平面上升对该社区的影响,可以构建一个包含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和恢复力的脆弱性函数模型。具体而言,用海平面上升速率表示暴露度,社区建筑的防潮能力表示敏感性,防洪设施的建设表示适应能力,社区经济水平表示恢复力。通过收集过去十年海平面上升数据、社区建筑防潮数据、防洪设施建设情况以及社区经济状况数据,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

网影响。然后通过回归分析确定各要素的权重,建立综合脆弱性指数。利用该指数评估社区在不同情景下的脆弱性程度。

5) BP(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模型法

BP 神经网络模型法通过划分指标数据区间和评价标准,构建 BP 神经网络输入输出层和网络拓扑结构,将数据导入训练好的网络模型,得出脆弱性评价结果。该方法具有较强的非线性映射功能,能够很好地反映脆弱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但网络结构的选择尚无统一理论指导。在实际应用中,BP 神经网络的构建和训练过程可能需要根据具体问题的需要进行调整与优化。其中,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对 BP 神经网络的性能有很大影响,因此需要确保收集到的数据具有高质量和代表性。另外,脆弱性评价的结果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模型的结构、参数的选择、数据的处理等,因此需要进行充分的验证和分析。

6) 决策树分析法

决策树分析法是根据数据资料生成决策树分类器,通过参数调整与运算,确定理想的决策树,并利用决策树分类器对脆弱性进行评价、分类。该方法有利于明确评价指标之间的关系,但各单元的评价结果被划分为高、中、低几个类别,不够精确。在构建决策树时,应确保所有重要因素都被考虑在内,并且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晰明确。分配概率和权重时应基于充分的数据和专家经验,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其中,评估结果应作为制订防灾、减灾措施的重要依据,但也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和优化。

除了上述描写的评估方法外,常见的还有面向对象分析法、空间多准则评估法、图层叠置法、模糊物元评价法、危险度分析等方法。基于此,脆弱性评估方法涵盖了从自然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内容,为全面理解和应对脆弱性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每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局限,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应用场景。例如,VSD 评估框架立足于传统的“暴露、敏感、适应”的脆弱内涵理解,ADV 评估框架侧重于对人类自身脆弱性的阐述,综合指数法适用于快速评估地区的脆弱性程度,而函数模型法则更适合深入分析脆弱性的内在机制。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脆弱性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关注耦合系统脆弱性过程与机制,探究脆弱性驱动因素和演化机理,科学界定脆弱性关键因素阈值,挖掘和提取多源遥感数据信息,开展系统脆弱性动态评价和时空分析,最终满足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1.3.2 抗逆力理论

1. 抗逆力的含义

抗逆力(resilience),在心理学中,指的是个体在面对生活的逆境、创伤、灾难、压力等负面事件时,能够自我恢复、适应和成长的能力。它如同一种心理抗体,帮助个体抵御挫折和压力,保持心理健康。“抗逆力”一词最初源于物理学,用以描述如橡胶等弹性物质在受到外力作用后的恢复能力。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深入,抗逆力作为一个概念开始被明确提出,心理学家称之为“心理弹性”或“心理恢复力”,用以描述个人、家庭或组织在面对危机或困境时,能够作出积极应对和建设性处理的能力。例如,美国精神病学家诺曼·加梅齐(Norman Garmezy)将“抗逆力”一词引入儿童发展性精神病理学中,

自此抗逆力概念被独立应用于儿童的精神问题领域,表示个体面对高危环境和困境时表现出来的良好适应性与抗压性。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生态环境学领域专家在原有稳定性概念的基础上引入抗逆力概念,以此衡量生态系统适应变化、维系稳定状态的能力,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正式将抗逆力作为学术概念率先提出。此后,抗逆力逐步扩展到组织管理学领域,侧重描述组织范围内的适应和恢复能力,同时也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是指面对冲击时个人、组织等对不确定性的回应。20世纪末期,在借鉴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抗逆力作为衡量灾害系统的一个属性正式应用于应急管理领域。人们从传统灾害的应对视角将抗逆力界定为个人、组织和系统应对突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能够承受和抵抗外部冲击以及恢复的能力。例如,Timmerman最早将抗逆力界定为“衡量系统从危险事件中吸收和恢复能力的一部分”;以Kwok为代表的学者将应急管理领域的社会抗逆力解释为“社会实体和机制预测、吸收和适应灾害的能力,以及开展恢复活动以减少未来破坏及其影响的能力”。其中,社区抗逆力在这一阶段逐渐成为抗逆力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社区抗逆力强调社区在面对风险和挑战时的整体应对能力,包括社区的物理设施、制度建设、社会资本等多个方面。

目前,学界对抗逆力的概念界定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对于这一概念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特质论、结果论、过程论和多面向论。

(1) 特质论把抗逆力定义为个体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潜能或特质,这包括一系列的认知和情感心理特质,如人格特质和自我观念(陶欢欢,2009)。这种特质使个体在面对逆境、压力或挑战时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有效应对并恢复过来。抗逆力作为特质,通常被认为是相对稳定的,并受到遗传、早期经历、个性特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2) 结果论认为抗逆力应该被视为适应良好的结果,而非一种固定品质。这意味着在环境和风险因素发生变化时,抗逆力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从结果的角度来看,抗逆力更关注个体如何展现积极的适应结果。

(3) 过程论认为抗逆力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强调个体如何利用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来应对逆境。这个过程包括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以及环境对这些反应的支持或阻碍。

(4) 多面向论认为抗逆力是一个包含多个维度和层面的综合概念。它不仅涉及个体的内在特质和能力,还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如社会支持、资源获取等)对个体抗逆力的影响,强调抗逆力的复杂性和多维性。

除了上述的四种观点外,也有学者认为,抗逆力是在某一时点上,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相互影响、博弈的过程。因此提到抗逆力的概念一般也会通过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来理解。其中风险因素指个体所生活的环境中造成其在生存和发展上出现消极结果的因素。正是由于风险因素的存在,个体才能展示出其抗逆能力。保护因素是指那些能够促使个体更好地应对生活事件、减少消极发展的个人或环境因素(李燕平,2005)。保护因素常从内、外两方面理解,内在保护因素就是当事者具有的一种积极生理和心理潜质,能够在适当的条件下激发出来,并帮助个体在面临危机和逆境时,柔性应对,顽强生存(刘劲松,2013);外在保护因素则是从家庭、学校和社区等环境中进行分析的,如刘劲松(2012)指出有三项指标对形成保护性外在环境至关重要:一是充满关爱和互助的生活环境,二

是寄予期望和支持的精神后方,三是参与实践的机会和锻炼的平台。在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相互影响、博弈的过程中,个体的内部资源(如自我效能感、乐观主义)和外部资源(如社会支持、经济稳定性)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个体对逆境的反应和适应能力,也就是抗逆力。个体的抗逆力并非静态不变,而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和环境条件下,相同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可能对个体的影响也会不同。

2. 抗逆力研究

1) 研究视角: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

问题视角主要关注个体或系统在面对逆境时所存在的问题、挑战和缺陷。它倾向于识别和分析导致抗逆力不足的原因,以便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问题视角下,抗逆力被视为需要被修复或增强的能力,而不是个体固有的积极特质。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问题视角的研究者可能会关注那些面临学业压力、家庭矛盾、同伴关系紧张等问题的青少年。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分析这些青少年在应对逆境时表现出的问题行为、负面情绪和认知偏差。例如,研究发现一些青少年在面对挫折时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甚至采取逃避、攻击等不良行为,基于问题视角,研究者会提出一系列干预措施,如心理咨询、家庭治疗、学校支持等,旨在帮助青少年解决这些问题,提高他们的抗逆力。在社区灾害应对方面,问题视角的研究者会关注社区在灾害发生后的恢复能力和存在的问题。他们可能会评估社区的基础设施、应急响应机制、居民自救互救能力等方面,以识别导致社区抗逆力不足的因素。例如,研究发现一些社区在灾害发生后存在救援物资短缺、信息传递不畅、居民参与度低等问题,基于问题视角,研究者会提出改进建议,如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应急响应机制、提高居民自救互救能力等,以提升社区的抗逆力。

优势视角强调个体或系统在面对逆境时所展现出的积极特质、资源和能力。它认为抗逆力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可以帮助个体或系统克服挑战并实现成长。在优势视角下,研究者会关注个体或系统的优势资源、成功经验和 社会支持等方面,以激发其内在的抗逆力。在青少年抗逆力培养方面,优势视角的研究者会关注青少年的积极特质和潜力。他们可能会通过团体活动、案例分析等方式,引导青少年识别自己的优势资源,如兴趣爱好、社交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同时,研究者还会鼓励青少年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例如沈之菲(2010)提到,抗逆力就是以优势视角看待青少年,认为个体是自己问题解决的专家,任何解决问题的资源都存在于个体身上,发现和利用个体现有的力量与资源,是个体抗逆力提升的关键。同样,在职场环境中,优势视角的运用可能包括识别员工的核心技能和激励因素,并调整工作环境以发挥他们的长处,提高工作满意度和生产力。

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在抗逆力研究中各有侧重。问题视角关注识别和解决导致抗逆力不足的问题,更适合处理具体的、紧迫的问题,尤其是那些需要立即干预以防止进一步恶化的情况。这种视角有助于提供针对性强、反应迅速的服务,以缓解个体的即时压力。然而,长期而言,仅仅关注问题本身可能忽视了个体的整体发展和成长潜力。而优势视角则强调挖掘和激发个体或系统的积极特质与资源,不仅帮助个体应对当前的逆境,还培养了他们未来面对困难的能力,并非仅仅是问题的解决。但优势视角也有其局限性,在一些紧急或严重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个体的内在资源和优势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此时,问题

视角中的直接干预可能是必要的。在实际应用中,这两种视角可以相互补充,共同促进抗逆力的提升。如可以从问题视角入手,快速缓解个体的即时危机,随后转入优势视角,发掘和利用个体及社群的内在力量与资源,以实现长期的适应性和积极发展。

2) 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对抗逆力的研究,主要有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

定性研究强调对抗逆力的深入理解,通过个案研究、访谈和观察来获取丰富的、细节化的信息。这种方法通常关注抗逆力的发展过程,而非单一的行为或结果。定性研究可以揭示抗逆力如何在个体的生活经历中逐步形成,并探索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转折点和影响因素,注重个体的主观体验和视角,认为每个人的抗逆力经历都是独特的。通过个人叙述,研究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个体如何利用自身及外部资源来应对困境。例如孙瑞琛等(2010)在研究汶川地震后个体抗逆力中,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个案研究,使用参与式观察、心理咨询的记录文本分析及生活随访。田国秀、侯童(2012)于2008年9月—2010年7月,在北京某中学通过参与观察、半结构式访谈、焦点小组等方法,对学习困境中的学生的干预过程与效果进行研究。雷鸣、戴艳(2012)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方法,着重从压力源、应对的内外资源方面进行访谈和录音,归纳出优秀贫困大学生心理复原力内外在保护因子。姚进忠、郭云云(2014)项目研究运用参与式观察、生活随访、入户调查等方法收集相关资料。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巴克尔等通过实证调研和专家讨论,得出对个体和社区的抗逆力定性评估方法。穆斯塔法(Mustafa)通过实证调研和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等方法发现,灾难抗逆工作的关键是集中救助脆弱的对象,并且提出社会经济不平衡和性别会对抗逆力造成影响。诺里斯(Norris)等认为社区抗逆力是社区的适应能力面对灾难或突然的变化进行适应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包含经济发展、社会资本、信息和交流以及社会支持的概念模型,认为四个维度决定了一个社区恢复能力的大小。要想增强社区抗逆力,需要减少资源和经济的不平衡,增加组织之间的联系,促进和鼓励社会支持,以及拥有灵活的、有弹性的和可信任的信息资源。

定量研究主要使用问卷、量表和其他标准化工具来收集数据,以确定影响因素。这种研究方法产生的结果是具体且可量化的,便于进行比较和复制。这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并为制订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提供了依据。例如,师彦洁(2011)研究的第二部分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高中生日常性学业复原力、自尊、社会支持的特点进行考察,并探讨了自尊、社会支持与高中生日常性学业复原力之间的关系。沈之菲(2009)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对上海市5个区的3662名中小学生学习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和抗逆力的情况。韦海燕(2009)在对大学生复原力的干预的研究中,采用观察记录、量表施测、成员访谈、反馈等手段进行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郭雪萍(2011)运用复原力量表、情感指数量表和一般心理健康问卷,通过整群抽样的方式对河北省664名大学生的复原力、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进行评估。佩顿等研究了新西兰受到鲁阿佩胡火山1995年和1996年爆发影响的社区恢复情况,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通过对社区进行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问题解决能力、社区从属感和年龄是社区灾难抗逆力的主要预测变量。

3. 抗逆力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1) 应急管理领域中的抗逆力的含义

在应急管理领域中,抗逆力指的是系统对各种风险和灾害的适应与恢复能力。抗逆力强调系统能够积极对抗和适应风险灾害的冲击,通过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互动机制,发挥自组织作用的内在特质。在动态的应对过程中,抗逆力还包括快速减灾和恢复常态的能力,这需要调用多样性策略、冗余资源和启动重构。樊博和乔楠(2022)构建了包括属性、结构、过程、能力的多维度抗逆力概念集合,进一步细化了抗逆力的理论框架。

(1) 属性维度方面。MCEER(地震工程研究多学科中心)提出抗逆力的四个因素:鲁棒性(robustness)、冗余度(redundancy)、富足性(resourcefulness)、快速性(rapidity),简称4R模型,这四个要素可以应用到任何社会系统中。其中,鲁棒性指在面临环境突变时,系统抵制破坏并能持续、有效运行;冗余度指在社会系统面临打击或破坏时,其他系统能够替代原系统继续提供基本功能和服务;富足性指社会系统能够有效地动员资源的充裕度;快速性指在面临危机时,迅速反应对事件予以反应的时间长短。

(2) 结构维度方面。王艳等学者基于凯恩琳·蒂尔尼对强抗逆力系统的过程和结构特征的描述进一步阐述抗逆力的测量,他们认为抗逆力建立在明确抗逆力来源基础之上,其来源可分为过程和结构两方面,强抗逆力的形成来源于系统的结构要素和过程要素的持续改进。在结构要素中,其测量包括系统多样性、结构去中心化、组织网络化、社会资本。系统多样性指响应计划和响应策略的多样性有助于灾害应对;结构去中心化指地理位置去中心化可以降低灾害或恐怖袭击对组织或系统的影响,而危机发生时,决策的去中心化与冗余性和丰富性相关;组织网络化指在灾害发生时,组织网络能够在技术系统的支持下及时收集、交换和共享信息,以实现相互适应、动态调整;社会资本指在灾害研究中,个人和社会团体的社会资本也被认为是提高组织抗逆力的结构要素,社会资本的增加有助于增加个体获得的信息量,丰富其物质财富,从而增强个体与团体潜在合作的可能性,并获取相应的情感支持。

(3) 过程维度方面。过程维度中构成要素可归纳为利益考量、信息互动、应急灵活性。不同于关注系统内部组成与特性的结构要素,过程要素强调外部环境各主体之间互动协同,主要涉及信息互通、应急处置协同以及制度引导各行动者进行合作。其中,利益考量指组织在时间和工作量的压力下,出于利益考量,往往会偏离安全实施标准或原来已经设定的工作程序,逐渐积累的小偏离的集聚最终导致组织远远脱离已经设定的安全轨道,从而引发灾难性事故;信息互动指在灾害发生时,关键节点能够协调组织间分享信息,共同解决问题;应急灵活性指及时调整方式与手段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应急环境。

(4) 能力维度方面。Vugrin和Ehlen、Béné等学者提出抗逆力系统由三种属性构成,可以通过量化进而改进系统。这些属性是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其中,吸收能力指承灾体本身对外界冲击的直接承受能力,包括:承受的幅度和频次,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风险;适应能力指承灾体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调整并适应的能力;恢复能力指承灾体在突发事件冲击后的修补能力,包括恢复程度和速度等能力。

2) 应急管理领域中的抗逆力研究

抗逆力研究多聚焦于生态学和心理学领域,而应急管理领域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社区

抗逆力,相关理论探索与实践总结主要来自国外的社区研究。国内对抗逆力这一重要理论转向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多侧重于心理学领域的微观个体层面,对于应急管理学科视角下的抗逆力研究十分匮乏。从研究单位的角度,应急管理领域的抗逆力研究可以分为国家层面、社区层面和个人层面。

(1) 国家层面: 风险防控模型(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odel)将环境与土地等资源要素纳入抗逆力的考察内容,强调应急抗逆力中资源丰富性的问题。美国地震工程研究多学科中心最早开展对灾害抗逆力概念的研究并提出4R模型,将鲁棒性、冗余度、富足性和快速性视为抗逆力概念的重要内涵,认为这四个要素适用于任何社会系统之中。GFM(Global Focus Model)模型将应急抗逆力划分为经济能力、组织抗逆力与基础设施承受力等维度,认为政府灾后组织能力、非政府组织规模以及基础设施数量与密度能够很好地回应同等级灾难不同地区受灾程度不同的问题。

(2) 社区层面: 抗逆力能力(Resistance Capacity)模型将社区居民归属感、信任等社会资本要素纳入抗逆力的概念中。Cutter等提出社区基线抗逆力模型,包括环境、社会、经济、组织、基础设施、社区竞争力等方面,围绕生物多样性、社会网络与信任关系、政府应急预案完备性等对抗逆力进行概念解构。杜兰大学等组织从抗逆力的时间序列过程变化方面对抗逆力概念进行了定义: 抗逆力即在应灾过程中浮现的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以及恢复能力。Coles和Buckle(2004)则把社区抗逆力等同于社区从灾难中充分恢复的能力、技巧和知识。Pfeferbaum(2005)认为,抗逆力是指社区成员采取有意义的、慎重的以及集体的行动,以补救由问题带来的影响,包括对环境的解释、干预及行动的能力。苏映雪等(2022)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复杂系统特征出发,前期研究将社区抗逆力系统界定为受政治、文化、经济等多种外部环境因素影响由众多要素、利益主体构成,以实现防灾、减灾和灾害管理为宗旨,具有非线性、复杂动态反馈的主体适应系统,包括社区基础特征子系统、灾害管理子系统、社会资本子系统以及社区发展能力子系统。

(3) 个人层面: Sherieb以个体应对灾害的能力为视角,引入信息、社会资本、社会支持等要素建立了抗逆力概念网络模型。Garmezy基于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建立了行为目标模型,强调个体能力(competence)对于抗逆力的影响。Rutter从环境与个体两个角度提出四种策略,认为降低外部风险与提升自我效能感对增强个人抗逆力同样重要。Adger从降低风险因素这一维度开展研究并建立个体—环境策略模型,强调风险因素的刺激与保护因素的应激是相互博弈、相辅相成的关系,由此呈现出抗逆力运行的关系框架。Pelling主要关注个体面对灾难的脆弱性,把个体面对灾难的脆弱性细分为暴露程度、抵抗能力和抗逆能力三个维度,面对灾难个体体现的抗逆力被其认为是个体面对灾难表现出适应的能力。

1.3.3 风险感知理论

1. 风险感知的概念

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又称风险认知,是指人们对风险事物和风险特征的感受、认识和理解。风险感知属于心理学范畴,是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并强调个体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认知的影响。风险管理是基于

人们已有的风险认知水平而采取的评估和管理活动,因此,风险感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奥尔特温·雷恩(Ortwin Renn)与伯内德·罗尔曼(Bernd Rohrmann)的观点,风险感知具有以下特点。

(1) 风险感知受媒体的影响,因为现代社会面临的多数风险无法为人类感官所体验,而主要是通过沟通学习到的,风险相关信息的传播方式和公众获取、解释信息的方式会对风险感知产生影响。其中,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人们的注意力会表现出选择性偏好。不当的风险沟通可能导致公众风险感知的偏差。

(2) 社会因素影响风险感知,因为人们在接收信息后,通过常识机制处理信息并作出推论,这个过程容易诱发直觉偏见,风险感知中的直觉常常是不可靠的,容易受到社会因素如文化、群体心理等的影响。对于一个风险,人们对其严重程度的感知受以下因素的影响:①预期死亡人数或损失;②灾难性潜能,如人们认为低概率、高损害结果的风险比起高概率、低损害结果的风险更加可怕;③被感知到的风险源或风险情境的属性,如风险是不均衡的,则被认为是严重的;④与风险原因关联的信念。

(3) 个体特征也会影响风险感知。其中年龄、性别、职业等个体差异导致不同的风险感知特点。个体的知识、经验和过往风险事件的经历也会影响其对新风险的感知与反应。

另外,美国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B. 费希霍夫等描述了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两种风险感知模式:一是风险相关模式(risk related patterns),该模式下,个体感知到的“恐惧”并不因与风险相关的客观事实改变而发生变化。以交通类风险感知为例,尽管机动车事故的死亡率远高于飞机坠毁事故,但人们往往认为:驾车时遭遇车祸更易导致伤亡,而飞机一旦失事则难以幸存。这种认知差异体现了统计数据与个体风险感知之间的矛盾——即便客观数据表明汽车更危险,主观上飞机事故的不可控性仍会强化其威胁性。二是情境相关模式(situation related patterns),主要与风险所处的背景相关,在“日常饮食”情境之下,人们觉得只要自己愿意,就能够轻易地控制自己不吃危害健康的食物,比如甜食、饮酒等,而对于转基因、化学合成这类食品,有着高度的敏感性,这主要在于人们觉得这类食品处于公共机构缺乏监管的“失控”状态。对于同样的风险后果,人们的关注度可能完全不一样。

为了理解人们面对风险的不同感知模式,雷恩将风险分为五类:即时威胁型、听天由命型、挑战自我型、机会游戏型与潜伏危害型(表 1-2)。

表 1-2 雷恩风险分类模型概述

类别	典型示例	专家观点	公众感知
即时威胁型	核电站、危化品存放点、液化天然气罐等技术型事故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发生概率可计算 2. 可通过有效技术手段降低发生概率、减轻事故后果 3. 人们将技术型事故往往归因为某组织或个体“行动与事故决策”的后果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发生概率即使很低,也可能随时发生 2. “概率”对于事故发生而言毫无意义

续表

类别	典型示例	专家观点	公众感知
听天由命型	地震、洪水、龙卷风等自然灾害	与技术型事故相比较,人们对此类灾害的归因更多基于宗教信仰、神话传说或其他神秘观念	1. 远离或逃跑 2. 否认其存在
挑战自我型	登山、滑翔伞、攀岩等探险运动	1. 活动的目的并非获益,而在于冒险活动本身 2. 某些技术型事故与“本能的冒险渴望”相关	1. 证明个体的能力 2. 体验战胜自然或其他风险的成就感 3. 出于某种冒险的本能渴望
机会游戏型	博彩	1. 风险概率已知,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技术型灾难 2. 风险活动收益和损失与个人能力无关 3. 将健康或个人生活做赌注时,会造成危害	1. 成本收益间的极大反差与总有获益者的现象,让人们相信“自己会是下一个获益者” 2. 受到某种个人系统思想的支配,如幸运数字、星座预测等
潜伏危害型	食品添加剂、离子辐射、农药、转基因食品等	1. 科学家的研究很难满足公众对于“确定答案”的需要 2. 科学家的预测得不到证实 3. “可能性与后果”不再是判断和认知此类风险的主要衡量标准	1. 总是期待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将风险与风险源画上等号 2. 对于低概率的相关事件显示出极高关注水平,如某些动物大批死亡等 3. 具有将自己放在受害者位置的倾向

资料来源:方曼. 风险感知跨学科研究的理论进展与范式变迁——基于心理学视域的解读[J]. 国外理论动态, 2017(6): 117-127.

2. 风险感知的两大流派

风险感知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开始关注公众对风险的认知与评价。研究者 Sowby 设计出了一整套风险对比方法,这一方法的本质是与风险沟通相关联。Starr 的发现表明,风险可接受性不仅关系到风险本身的收益评估,还需要考虑人们的主观尺度,如自愿性等。他的理论为风险感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20世纪70—80年代,以斯洛维奇为代表的研究者运用心理学方法来研究风险问题,侧重对风险根源的主观特征和主观感受的测量。斯洛维奇等利用心理测量范式模型对风险感知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测量,依据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感知风险是可以量化并预测的,二是“风险”对每个人具有独特含义。20世纪90年代,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学者提出风险的文化理论流派,强调从认知主体自身生活方式的视角理解风险感知及与风险有关的行为的流派。21世纪初以来,风险感知研究的理性决策阶段逐渐实现了跨学科与范式变迁的统一,各学科之间的互动促进了理论的发展。当代风险感知理论研究流派趋向于融合,文化理论流派和心理测量流派之间出现了学科融合研究趋势及后现代趋势。

1) 风险的心理测量流派

风险的心理测量流派,其代表人物有斯洛维奇、里纳特·舍贝里(Lennart Sjöberg)等,他们主要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风险问题,侧重对风险根源的主观特征和主观感受的测

量。风险感知研究的策略是建立一个灾害分类体系,以便了解和预测人们面对风险时的反应。分类框架能够被解释为人们为何对一些灾害所造成的风险极度地厌恶,而对一些风险则表现得相对冷漠,还可以反映出专家的观点与真实反应之间的差异。要实现这一目标,最为普遍的方法就是心理测量范式,该方法使用心理缩放和多元分析技术来完成人对待风险的态度与感知的定量化。利用心理测量范式,人们能够定量地判断多种不同灾害的当前风险和期望风险与风险的调节期望水平。这些判断与风险的其他属性相关联,例如:①用于假设风险感知与态度的风险特点情况(如自愿、恐惧、了解、可控性等);②每种灾害带给社会的收益;③每一年由于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④灾害年由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因此,风险的心理测量学派认为,风险的心理测量理论最重要的前提假设之一为风险是主观的风险,而不是客观的风险,即风险不是独立于人们头脑和文化之外等待被测量的东西。风险是由受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个人主观定义的,所以只要调查工具设计合理,当中的很多因素与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就可以被量化和模式化,从而阐明个人和社会面对灾难时的反应。

斯洛维奇等将心理测量范式运用于风险认知的测量获得了大量的实验数据,成为探讨个体风险认知状况的重要基础。其中,多维风险特征的测量方法是对心理测量原理最具特色的发展。风险特征评价维度的形成完全是基于风险问题的特异性而设计的,对界定和分析风险事件的性质有独到作用。风险特征维度是二级评价指标,被试在各个风险特征上评价多个风险因素,在此基础上可形成风险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依靠风险认知地图能够相当直观地标识出风险因素的位置与性质,为学者提供了一个有效评价风险认知状态的工具。

斯洛维奇等主要是运用调查问卷法直接询问人们对风险和收益的感知以及人们对不同风险/收益权衡的偏好。他们主要是通过让人们按被认为对风险感知和接受有影响的不同性质或特征,如自愿性、灾难潜力、可控性及恐惧程度等对这些特征排序,从而总结出“灾难人格”的特征,换言之,即主要运用多种心理测量标度方式,对感知风险、感知收益和感知的其他方面进行定量分析。斯洛维奇等在风险感知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提出因子分析描述模型。因子分析描述模型试图揭示普通公众对各种危险的感知状况和认知特征。斯洛维奇等对 34 名受访者进行关于风险特征的调查,通过因子分析,从 15 种风险特征中提取出了两个主要因子——恐惧风险和未知风险,这两个因子共同解释了公众对危险的感知状况和认知特征。研究绘制了一个基于因子分析结果的风险空间排列模式,展示了 8 种危险在因子空间中的分布情况,这些分布与公众的风险感知紧密相关。研究发现,恐惧风险因子得分较高的危险,公众更倾向于减少其风险并希望通过严格规范来降低风险水平。专家与公众在风险感知上存在显著差异,专家倾向于将风险视为年度预期死亡率的同义词,而公众的风险感知则与各种风险特征或因子紧密相连。情绪因子和认知信任因子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而社会信任因子的作用相对较小。情感和情绪在风险感知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影响人们对风险的整体知识库和认知评价。启发式影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情感和态度在风险感知中的重要性,积极态度的人群往往感觉到相对较低的风险。另外,恐惧的概念在风险感知研究中被扩宽,包

含态度和制造混乱之间的关联,这表明恐惧与人们的态度密切相关。通过态度这座桥梁,恐惧的概念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揭示了风险感知的复杂性,即风险感知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过程,涉及情感、认知、社会信任等多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为了更全面地理解风险感知,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以便更好地预测和管理公众对风险的反应。

(2) 提出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它描述了风险在传播过程中的两种情形:放大和弱化。这个框架强调了心理、社会、文化和政治因子在风险传播中的互动作用,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风险的管理和干预。在风险的放大过程中,风险的影响范围扩大,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促使风险管理上的干预。相反,在风险的弱化过程中,风险的影响被限制,可能导致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的发生减少,风险管理上的干预受到阻碍。风险的传播不仅在时间上有所延续,还在不同的部门和领域之间扩散,形成复杂的影响网络。风险的影响还受到地理条件的影响,不同地区的风险感知和管理策略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社会群体的互动、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讨论,都在风险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可能加剧或减缓风险的放大效应。同时个体的心理特征,如恐惧、信任和认知偏差,影响他们对风险的感知和反应,从而影响风险的传播。另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塑造了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和评价方式,影响了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最后,政治决策、政策制定和治理结构对风险管理具有重要影响,可能促进或阻碍风险的放大。因此,风险管理干预应考虑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采取适当的沟通和政策,以平衡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实际风险水平。

(3) 污名化与风险感知的深入探讨。污名化是指当一个地点或群体与某种负面形象或行为联系在一起时,它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受损的过程。这种联系往往导致对该地点或群体的社会排斥和经济排斥。污名化不仅影响被污名化的地点或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还可能引发公众的恐惧和回避行为,降低该地点作为旅游或居住地的吸引力。污名化的信息通过媒体、社交网络等渠道传播,增加了公众的风险感知,使原本可能被认为风险较低的事务被视为高风险。人们往往将污名化的标签与特定的地点或群体联系起来,这种联想一旦形成,就会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影响他们的决策和行为。例如,斯洛维奇等于1986年和一群跨学科的社会学家一起预测国家将高放射性核废料仓库建在内华达山脉并投入使用,对内华达州南部居民和社区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污名化”与风险感知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研究表明,有10%的受访者一提到内华达州即会引发其与核有关的联想,研究者认为这与核武器的实验地点在尤卡山脉附近有关。一旦出现与核有关的联想,人们就会降低把内华达州作为旅游胜地的偏好程度。因此,斯洛维奇认为,“污名化”的研究对有害废料处置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它表明,不管是哪些健康风险与废料产品有关,若一个地区被想象成受污染的或废料遍地的形象,就很可能产生重要的社会经济影响。其次,它加强了有效处理废料从而避免恶性事件(也包括即使没有严重健康风险的那些事件)发生的重要性。”

风险感知研究虽然为理解和管理风险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但其仍然存在诸多弊病。一是风险感知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个体如何接收和处理信息,而对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考虑不足。人们的风险感知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忽视了这一点,研究结果就

可能缺乏外部效度。二是研究中虽然引入了情感和价值观因素,但通常只是将其视为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变量,而非作为个体主动构建意义的基础,这种简化忽视了人们在面对风险时复杂的心理活动,包括情绪反应和价值判断。三是心理测量学派倾向于将个体对风险的反应归纳为普遍模式,忽略了个体间的差异性。这种方法不能充分解释不同个体在风险感知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对某些群体的特殊需求和反应的忽视。四是心理测量学派的研究,多聚焦于某一时刻的风险感知,而没有考虑风险感知随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动态性。这种静态的研究视角无法捕捉到风险感知的复杂变化过程,限制了对风险感知演变规律的深入理解。五是风险感知研究常基于一种假设,即公众的风险感知是非理性的,与专家的理性分析相对立。这种观点忽视了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经验 and 智慧,以及他们在面对风险时可能采取的合理策略。六是心理测量范式过分强调研究方法和统计技术,而对理论建构的关注不足。这种偏重导致了大量研究集中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上,而非理论的深化和创新,影响了风险感知领域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发展。

2) 风险的文化理论流派

风险的文化理论流派,其代表人物有人类学家道格拉斯·迈克·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等,该流派试图以认知主体自身的生活方式理解风险感知及与风险有关的行为。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感知是由社会和文化构建的,而不仅仅是由外部风险本身决定的。她特别强调了社会群体边界和分类系统在风险感知中的作用,认为不同群体对风险的感知和反应取决于其文化背景与社会结构。如她在其著作《洁净与危险》中,将“洁净”与“污秽”同社会分类和秩序规范联系起来,分析了不同文化背景对风险的不同理解和反应。汤普森探讨了如何以认知主体自身的生活方式来理解风险感知,强调了社会建构在风险感知中的作用。其研究指出,对风险的挑选和排序依赖于社会组织无法避免的文化偏好,现代人对风险的识别受到道德、情境和集体认知结构的影响。

道格拉斯和野夫文·威尔达夫斯基在《风险与文化》一书中,通过“格-群”模型来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的风险感知和偏好。其中,“格”即“网格”,代表社会规范和约束的强度,反映了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群”即“群体”,表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密切程度,反映了社会网络的紧密性。因此,面对风险时存在四种不同类型的人群,这四种类型的人群选择关注的风险类型存在很大差异,分别是:等级主义者,即高“格”和高“群”,倾向于强调权威和社会秩序,认为风险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威胁;个人主义者,即低“格”和低“群”,重视个人自由和市场选择,认为风险是商业机会的体现;平等主义者,即低“格”和高“群”,强调平等和共同体,将风险视为集体行动的驱动力;宿命论者,即高“格”和低“群”,由于外部控制感强,往往对风险持一种被动接受的态度。当前的研究通常集中在经验理论对这四类人群的风险感知的定量化研究的转换中。

文化理论为理解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风险感知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有助于解释为何不同群体在面对相同风险时反应迥异。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可以更全面地揭示文化因素如何塑造个体和群体的风险感知与行为模式。尽管该理论在解释力和应用性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文化理论倾向于认为风险感知主要受社会历史文化塑造的世界观影响,而忽视了风险本身的性质。这种偏向可能导致对风险的客观评估不足,从而在风险管理上产生偏差。二是文化理论强调社会情境的重要性,但在将其

有效融入具体的风险感知研究中却显得不够充分,这导致理论假设与实际研究之间存在脱节。如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理论阐述层面,缺乏足够的实证数据来支持文化理论在实际风险感知和评估中的应用。三是研究者试图通过个体水平的调查来间接测量文化相关过程的结果,但这忽视了文化理论所强调的社会结构和群体互动层面的因素。

3. 风险感知理论的研究趋势

风险感知理论的研究趋势是多方面的,涉及不同学科的融合、后现代转向以及对公众风险感知现实意义的探讨。这些趋势不仅反映了风险感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指示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1) 学科融合

学科融合趋势主要体现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两种研究视角的交叉与融合上。心理测量流派强调运用心理学方法对风险根源的主观特征和主观感受进行测量,而文化理论流派则运用社会学从认知主体自身生活方式的视角理解风险感知及与风险有关的行为。斯洛维奇指出,灾难的社会性反应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个体心理认知、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结构等。这要求研究者从多维度、多领域进行探索,以全面理解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心理学和社会学在风险感知研究中的应用,促使两者的理论框架相互融合,形成了更为综合的分析模型,有助于揭示风险感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心理学家在风险感知研究中越来越关注风险对象的社会、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对个体的风险感知有重要影响。同时,他们也开始弱化对现实假设因素的关注,转而更加注重主观解释和情境依赖。社会学家在风险感知研究中更加强调风险的现实性,并尝试针对风险认知和反应作出更多个人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考虑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互动模式。

2) 后现代转向

后现代转向主要体现在诠释性风险感知研究流派的兴起上。诠释性风险感知研究流派主要运用解释学和现象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风险问题。解释学强调对风险问题的深度理解和解释,侧重于挖掘风险背后的深层含义,而非仅仅进行表面的量化分析。现象学关注个体如何体验和理解他们所处世界中的风险。这种视角强调直接经验和主观感受,认为这些是理解风险感知的关键。另外,诠释性流派采用定性的(如扎根理论)或混合法等研究方法,获取对给定风险问题在其中被识别并理解的情景的“深度描述”,强调人们所处的环境和情景的特定性是解读风险的重要特征。这是因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解读实践的逻辑深受其体验与知识来源的影响。风险感知不仅是个体心理过程的结果,还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这种情境依赖性要求研究者将风险放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进行分析。

3) 公众风险感知的现实意义

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公众的风险感知对风险管理政策制定的前提和基础作用,强调公众参与在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性。首先,公众的风险感知对风险管理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因为政策必须反映公众的担忧和期望才能获得广泛支持。有效的政策需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公众风险感知的基础上,确保政策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其次,信息的传播方式和透明度显著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研究者呼吁通过有效的风险沟通促进公众对风险管理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如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的使用强化了公众风险感知,关

键行动者可通过社交媒体掌握重要信息源并在风险信息扩散过程中充当意见领袖。另外,研究者呼吁加强公众的风险教育,提高其风险认知能力。这不仅有助于公众更好地理解 and 应对风险,还能促进公众在风险管理中积极参与。这对于构建具有抵御风险能力的社会至关重要。

1.3.4 风险放大理论

风险放大理论的两个代表性理论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 SARF)和社会表征理论。这两个理论为理解公众如何感知和反应风险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

1.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

1) 社会放大理论的内涵

1988年,美国学者卡斯帕森夫妇(Roger E. Kasperson 和 Jeanne X. Kasperson)、雷恩以及斯洛维奇等提出了社会放大理论,指的是信息过程、制度结构、社会团体行为和个体反应共同塑造风险的社会体验,从而促成风险结果的现象。这一理论试图描述和解释风险,风险事件与各种心理、社会、制度及文化之间的互动如何增强或者减弱公众的风险感知,并塑造其风险行为,即为什么一个风险事件的最终影响会超过它的初始效应。“某些事件会导致次级后果的扩散,甚至可能超过事件最初的影响,引发原本无关的危害。”^①通俗地讲,就是引发“涟漪效应”。

在社会放大理论中,风险事件被视为一种信号,信息通过社会及个体“放大站”进行加工,公众的风险感知过程被转化为信号的解码过程。所谓“放大站”,包括技术评估专家、风险管理机构、大众传媒、社会团体中的舆论领袖、同辈和参考群体组成的个人网络等。社会“放大站”通过媒体、信件、电话、直接交流等沟通渠道制造和传输信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可能通过增加或删减某些形式和内容来改变原始信息。这种再解读过程会产生“涟漪效应”,使得风险感知在社会中不断被强化或弱化。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包含两个机制:一是信息传播机制,即对风险或风险事件的信息传递过程,这一过程受到信息渠道的影响。风险的社会体验无论是直接的亲身体验还是通过风险信息获得的间接体验,都可以是风险放大的根源,很多风险并非人们直接经历的,那么通过他人或媒体获知的风险信息就充当了放大的原动力,而“信息的量、信息的受争议程度、戏剧化程度以及信息的象征意蕴”等信息属性是放大或弱化风险的关键变量。二是社会反应机制,即对信息流的解读和反应,这一过程受到个体特征的影响,同时也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和制度的背景的影响。该理论假定了引发社会反应机制的四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个人和团体的价值偏好,即个人和团体在面对复杂的风险时,其价值偏好会显著影响对风险的评估。例如,对于环保重视的个人和团体,可能会对环境风险有更高的敏感度和更严的评估标准。第二种途径是社会团体关系,即利益相关团体的性质和目标会影响其成员对风险的认知与防范。例如,某个依赖特定资源生存的团体可能对该资源相关的风险更为敏感。第三种途径是信号值。风险事件是否传递出危险的预兆和信号,

^① 皮金,卡斯帕森,斯洛维奇. 风险的社会放大[M]. 谭宏凯,译.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以及这些预兆和信号的数值,是影响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新风险通常伴随着高信号值,意味着它们更容易被公众感知为威胁。同时风险的属性和危险程度也会影响其信号值。例如,具有潜在致命性的风险通常会被认为具有更高的信号值。第四种途径是污名化,即与不受欢迎的团体或个体联系在一起的负面形象,如污染、疾病等,会引发公众对风险的污名化,这种污名化给风险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 社会放大理论的研究现状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相关研究趋向“微观”,解释趋向“宏观”,从而丰富了风险“放大”隐喻的内涵,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1) 以“微观”研究探索问题,以“宏观”解释分析问题。当前以“微观”研究探索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者开始探索影响“放大”的因素。库哈尔(Kuhar)等将问卷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研究公众对佛罗里达赤潮的风险感知,得出熟悉度(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直接经验在风险的放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结论。第二,出现对次级影响和放大站的专门研究。巴克尔(Baki)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媒体在将钻井平台弃置深海的风险的放大中发挥的作用,揭示了绿色和平组织如何利用媒体成功地交流风险信号,对抗壳牌公司的计划。麦科马斯等将公众集会看作“社会放大站”,探索它对参会者的风险感知的影响,结果得出,公众集会作为一个“社会放大站”并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要与公众、官员以及其他的风险来源互动才能对风险感知有影响。第三,对“放大”和“缩小”机制的探索。卡斯帕森关注和讨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他认为,SARF假设了四个放大风险的机制:个人和团体的价值偏好、社会团体关系、信号值和污名化。除此之外,还有第五个重要的机制——社会信任,即如果公众对有关机构及其管理者高度或日益不信任,那么风险很容易被放大。雷恩认为,SARF可以与其他因果理论相结合来帮助理解放大和缩小的机制。他提出共鸣理论可以作为风险放大的解释机制,如果一条消息与目标受众产生共鸣,且他们承认自己与该问题的理解及其对行为的意义相关,那么就可能会产生放大。风险缩小的解释机制则可以借鉴公共资源理论,即如果某人的贡献被自己和他认为是边缘的和个人的牺牲,并且这些牺牲很快会被他人的过度消费所补偿,那么行为将不会遵循态度的导向,人们会出于抢先利用资源的动机而缩小感知到的风险。

解释趋向“宏观”是指对风险放大现象的解释更多地考虑到了社会文化制度因素,而不是从内部认知的角度一味地关注个体对风险信息“歪曲”。莱辛(Leschine)在他对石油泄漏和 risk 的社会放大与缩小的研究中提到,风险的缩小源自“信息流的官僚主义衰减”,人们没有注意的东西一直很危险,人们不了解它的原因是政府管理者使信息远离了他们。波莫代尔(Poumadere)等描述了法国热浪(heat wave)风险的缩小,充分利用已有数据对风险缩小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热浪的大部分易感群体的社会特征是老、孤、病、穷,一种污名效应和拒绝倾向在法国可能存在;法国各相关群体的态度,即公众对健康风险持宿命论的态度,精英(专家)采取保密态度,官方持盲目乐观的态度;死亡率和城市生活条件、贫穷、孤独、生病强相关,热浪被证明是沉默的受害者的无声杀手,揭露了面对风险时的社会不平等,是官僚政治管理失败的结果;物理和社会水平之间的复杂联系模糊了风险感知。

(2) 丰富风险“放大”隐喻的内涵。一是关注“放大”隐喻中的“缩小”的含义。如伯吉

斯(Burgess)以火山灰云为例,说明“天灾”风险被社会缩小的原因。通过频率统计,他得出在欧洲各国报道火山灰云的文章数目少于墨西哥湾漏油和猪流感。在关于火山灰云的报道中,缩小的符号远多于放大的符号,可见,火山灰云的风险在欧洲被缩小了。缩小的原因在于:没有严重的后果,缺乏主要的事件和伤亡;不期而至、持续时间短;没有明确的责任方。二是探讨风险被“放大”或“缩小”的发生条件。一些研究认为,风险的放大或缩小取决于人们的身份。如罗德(Raude)等以牛海绵状脑病(BSE)为案例,研究执业医师(GPs)如何评估和感知 BSE 相关风险,他们报告的对家人和病人的 BSE 相关行为,以及报告的行为和风险感知之间的相关程度。此外,一些研究还认为,风险的放大和缩小取决于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实际行为与在最佳可用的科学数据的基础上合理预期的行为之间的差异。如 Masuda 和 Garvin 通过考察地方、文化和风险的社会放大之间的关系得出,风险的放大或缩小取决于与文化世界观相关的经验,主要指人们的地方依恋和身份,即人们(局内人和局外人)将这个�地方看作一个生活的地方还是发展经济的地方。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风险是被放大还是缩小取决于社会情境。社会文化情境赋予人的诸多考虑,如意识形态立场、货币性损益、股东的责任等方面,都是风险放大的相关因素。三是扩展“放大”过程的含义。放大的过程就是一个信息的加工、建构、交流的过程和效应的传播过程。巴奈特(Barnett)和布雷克威尔(Breakwell)认为,SARF 反映了风险的生命历程,该框架的中心推力是某个风险事件的社会经济影响取决于社会过程,而不是该事件的物理特征。阿尔科克(Alcock)和巴斯比(Busby)也将 SARF 看作一种过程模型,但仅局限于某特定风险产生影响的过程,认为该框架仍关注特定的事件或问题经历转化并产生影响的方式,它没有特别地指向风险随时间迁移的过程。

(3) 多样化的研究方法。SARF 的研究至今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方法,主要包括资料分析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和分层方法。资料分析法有助于收集某一时间段内的多层次变量(不同的风险国家、领域),但是这种方法多基于一个潜在的前提,即某风险事件的报道频率等同于公众关注度、等同于风险感知和反应,这个前提中默认的关系的合理性还有待商榷。访谈法适合收集某群体的风险感知和行为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上的影响因素,他们的风险行为意向以及深层动机,有助于风险放大机制的探索。问卷调查法相对客观,多用来采集公众的风险感知、态度、信任度、行为倾向等,还可以纳入人口统计学方面的考虑,是实证研究的基础。分层方法实际上是资料分析法的一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广泛收集处于不同分析层面的资料,资料涉及个体行动、态度、情感或共同认识等方面,至少要包括两个层次的材料;②包括作为分析的系统焦点的时间维度,即收集到的资料应该覆盖一定的时间段,而且不同层次的材料应该对应相同的时间段,最理想的是收集到危险事件完整的生命周期的全部材料;③分层方法既分析横向某一时刻不同层面发生事件的关系,也分析纵向的同始终的变化,形成连续变化的剖面图,经过一定时间发生于不同层次的材料中的变化的并置是分析的重点。

3) 社会放大理论的研究争议

尽管 SARF 提高了预测哪种新出现或即将出现的风险可能被高度强化或弱化的能力,但该理论仍存在一些争议。一是基本概念的质疑。史蒂芬·瑞纳(Steve Rayner)教授批评说,SARF 将风险具体化,忽视了风险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性。他进一步指出,“风险

的社会放大”这一表述可能会引导人们关注被放大的风险,而忽略被弱化的风险。他还提到,“风险的社会放大”这一术语本身可能带有夸大风险的语义偏好,这可能会影响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和反应。二是风险放大路径的质疑。SARF中描绘的放大路径是单向的,实际上,风险的放大和弱化是一个动态的、多因素参与的过程,涉及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个层面的互动,这与实际风险传播过程中复杂无序的因素相矛盾。批评者担心这种模型可能会过分强调单一的风险沟通渠道。三是专家评估与公众认识之间的矛盾质疑。SARF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被专家评估为风险相对较低的灾害和事件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一些被认为风险较高的事件却没有引起关注。然而,多米尼克·达科特(Dominic Duckett)等认为,专家评估与公众认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不同的利益团体可能会提供不同的专家评估结果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这反映了风险评估中的利益冲突和政治斗争。这种多样性可能被SARF的理论框架所忽视。四是理论的应用局限。SARF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发展的,其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可能受到限制。这需要更多的跨文化和跨国研究来验证。另外,SARF被批评可能更适合处理突发的、急性的风险事件,而对于长期的、慢性的风险问题,如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其解释力度可能有限。

2. 社会表征理论

风险的社会表征理论由法国心理学家瑟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旨在理解和解释个体与社会群体如何构建、解释及应对风险。社会表征理论以常识理解新事物为出发点,关注个体和社会层面的交汇点,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达成共识,同时允许个体差异的存在。目前,社会表征理论已逐渐发展成为风险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在风险研究领域,社会表征理论特别关注人们如何形成对风险的认知、感知和反应。具体来说,社会表征是指群体成员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共享的知识、信仰、价值观和实践系统,对新异事物(如风险)进行解释和重构的过程。这种解释和重构旨在使新异事物与已有的表征系统相容,从而恢复常识在日常生活中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由于风险的出现威胁着人们的身份和已经建立的秩序,违反了人们对事物的预期,人们无法用已有的知识系统来解释和应对,因此会产生不安。为了缓解这种不安,重新构造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世界,社会表征的作用开始凸显。通过考虑风险的社会表征,可以更好地预测和解释公众对风险的反应,从而制定更有效的风险管理和沟通策略。

1) 理论基础

社会表征理论为风险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结构理论、身份理论和三角巧克力模型等。

结构理论认为,社会表征是由中央核心(central core)和外围元素(peripheral elements)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中央核心是社会表征中最为稳定、连续且核心的部分,它代表了群体成员共享的、具有普遍性和共识性的观念、意象与价值观。这些元素构成了社会表征的基础,为群体成员提供了共同的理解框架和行动指南。中央核心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它融合了社会文化因素,使得社会表征不仅仅是个体经验的简单叠加,而是具有深厚社会根基的集体知识。中央核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规范性,中央核心为群体成员提供了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指导他们在面对特定社会现实时如何行动和决策;二是功能性,它帮助

群体成员对外部世界进行分类和解释,促进人际沟通和社会互动;三是稳定性,中央核心的稳定性使得社会表征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不变,为群体成员提供稳定的认知框架。外围元素是围绕中央核心展开的、相对灵活和敏感的部分。它们受到社会情境、个体经验和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和动态性。外围元素的存在使得社会表征能够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保持其灵活性和适应性。外围元素有三项基本功能:一是防御,外围元素通过不断的变化和调整,维护中央核心的稳定性,使其免受外部环境的冲击和破坏;二是差异性,外围元素的灵活性允许个体在保持群体共识的基础上,展现出个性和差异性,促进群体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三是动态性,外围元素的变化使社会表征具有动态性,能够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和更新。中央核心和外围元素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中央核心为外围元素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和方向,而外围元素则通过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为中央核心注入新的活力和内容。这种相互作用使社会表征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动态性,既能够保持群体的共识和凝聚力,又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发展。

社会表征的身份理论强调,个体的身份定位是其对社会客体进行表征的出发点和基础。不同的身份背景,如性别、种族、职业、社会地位等,会塑造个体独特的认知框架和解释模式,从而导致对同一社会客体产生多样化的表征。这种表征的差异性不仅反映了身份认同的多样性,也揭示了社会结构对个体认知的深刻影响。在社会表征的身份理论中,新事物或社会变革往往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因为它们可能挑战现有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秩序。面对这种威胁,个体或群体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尤其是焦虑感。焦虑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防御机制,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以抵御潜在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表征成为一种重要的心理工具,帮助个体或群体理解和应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为了维护自我身份和自尊,个体或群体会采用一种分裂的机制来应对外部威胁。这种机制表现为对他人或外群体的极端化表征,即将外群体与威胁紧密联系起来,使用极化的词语和刻板印象来描绘他们。同时,个体或群体会将负面的经验和感觉向外投射,而将正面的经验和感觉保留在内部,以此构建一个积极的内心世界。这种分裂机制不仅强化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也加剧了群体间的对立和冲突。社会表征的身份理论对于理解社会现象、预测社会行为以及制定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揭示了身份认同在社会认知中的核心作用,提醒我们在分析社会问题时不能忽视身份因素。其次,该理论为我们理解群体冲突和偏见提供了新的视角,指出这些现象往往源于身份认同的威胁和焦虑感。最后,该理论还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启示,即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不同群体的身份需求和情感反应,通过促进身份认同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来减少社会冲突与偏见。

社会表征的三角巧克力模型,由鲍尔(Bauer)和加斯克尔(Gaskell)于1999年提出,用于解释和理解社会表征的复杂性与动态性。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将社会表征视为一个由主体(subject,简称S)、客体(object,简称O)和投射(projection,简称P)构成的三元组,这一结构可表示为:表征= $f(S, O, P)$ 。主体指的是参与社会表征过程的个体或群体。这些主体具有认知能力、情感反应和社会互动能力,他们通过自身的经验和背景来理解与解释社会现象。主体在社会表征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认知框架、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都会影响他们对客体的表征。客体是被表征的对象,可以是具体的物理实

体、抽象的概念、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等。在社会表征的过程中,客体是主体认知和解释的焦点。客体的性质、特征和变化都会影响主体的表征内容与方式。例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多样性成为一个重要的客体,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会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与经验来理解及表征这一现象。投射是指主体在表征客体过程中所采用的心理机制和认知策略。它涉及主体如何将自身的认知框架、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应用到对客体的理解与解释中。投射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的桥梁,它使主体能够将自身的内心世界投射到外部世界中,从而形成对客体的特定表征。投射过程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环境、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三角巧克力模型将社会表征视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其中主体、客体和投射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模型强调了社会表征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认为不同的主体可能对同一客体产生不同的表征。这种差异性的表征不仅反映了主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揭示了社会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外,三角巧克力模型还强调了社会表征的历时性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主体对客体的表征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表现为新的表征形式的出现、旧有表征的消亡或不同表征之间的竞争和融合。因此,该模型为我们理解社会现象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

2) 特点

风险的社会表征理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多维度的视角。该理论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多个维度出发,全面审视风险的感知、理解和应对过程。它不仅仅关注风险本身的物理或技术属性,更重视风险如何被社会成员所认知、解释和赋予意义。这种多维度的视角使得风险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

(2) 动态性与历史性。风险的社会表征理论认识到风险是动态变化的,它随着时间、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这种动态性和历史性使该理论能够捕捉到风险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独特特征,为理解风险的变化趋势提供有力支持。

(3) 强调社会互动。该理论强调风险是在社会互动中构建和感知的。个体或群体通过交流、分享和协商来形成对风险的共同认知与理解。这种社会互动不仅塑造了风险的表征,还影响了人们对风险的应对策略和行动。因此,该理论有助于揭示风险感知和应对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

(4) 尊重个体差异。尽管社会表征具有共享的核心成分,但该理论也允许外围成分的变化和优化,以及差异性的存在。这意味着不同个体或群体可能根据自身的经验、价值观和信仰对风险产生不同的感知与理解。这种对个体差异的尊重使该理论更加贴近现实、更具解释力。

(5) 指导实践应用。风险的社会表征理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还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它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和公众更好地理解风险的本质与特征,从而制定更加科学、合理和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与应对措施。同时,该理论还可以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和协商,使其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6) 促进跨学科研究。风险的社会表征理论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和视角,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和应对风险问题。

3) 未来研究趋势

关于风险的社会表征理论,未来研究可着重关注以下三个方面:①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构建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用于阐释风险现象的形成与演变机制。它强调了风险信息传递和社会反应过程中心理、社会因素的互动作用。然而,该理论在解释个体和社会放大站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反应模式方面存在局限性。社会表征理论则侧重于因果关系的探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未来研究可以将社会表征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融入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中,通过两种理论的有机结合,构建更为全面和深入的风险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将更好地解释风险如何被社会放大、个体和社会如何对风险进行认知、情感反应及行为应对等复杂过程。②解释公众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的不一致。在实际生活中,经常观察到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和情感反应与其实际应对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现象。例如,尽管公众在认知上已经接受了某种风险的存在,但在行动上却可能采取消极或回避的态度。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包括个体心理因素(如恐惧、侥幸心理等)、社会环境因素(如制度规范、信息传播等)以及文化背景等。通过综合分析这些因素,揭示公众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之间不一致的内在机制,为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提供依据。③明确风险表征的基本理论问题。风险感知是公众对风险的主观感受和理解,而风险表征则是这种感知在社会层面上的表现形式。未来研究需要明确风险感知是否和风险表征的某个维度(如态度)相同,或者风险感知本身就是风险表征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关系的明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风险在社会中的传播和演变过程。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风险表征的性质和变化规律。风险表征是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它是如何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演变的?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我们构建更为精准和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

案例讨论

“恶魔医生”事件

2022年8月14日,有网民匿名在网上发帖“如何看待某国内知名三甲医院某医生?”此帖一经发布,网友纷纷跟帖,指出该医生存在严重的医疗作风问题,包括频繁对患者使用高额治疗、夸大病情开展手术、用其他患者的结石和血液冒充手术患者的、随便给病人化疗与切肠等,相关舆情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引发众议。该帖浏览量突破1345万,跟帖数755条。8月16日,该院发布情况说明,对涉事医生开展调查,停止其工作。8月18日,该院发布情况说明“初步调查发现,该医生在医疗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将继续开展调查”。在此期间,随着国内主流媒体的报道,话题声量迅速升高,该事件相关热点话题在新浪微博的阅读量累计超6.48亿。随后8月20—24日,话题热度有所回落,但相关舆论话题逐步延伸至“组织—医院”“行业—医生”以及“卫生系统”等领域。8月25日,该院召开“改进医疗作风·规范医疗行为”专项行动启动会。8月26日,该省卫生健康委通报:“经初步调查,发现该医生涉嫌严重违法,并正接受该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相关话题历经二次爆发,新浪微博阅读量突破6.83亿,话题声量到达监测内峰值。8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评论文章《坚决维护医疗领域风清气正》,及时回应群众难点、痛点、焦点,坚决纠治医疗卫生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并适时发声,坐实该医生

存在违法、违纪情况,安抚网民情绪,话题热度出现二次回落。优讯舆情监测平台显示,截至8月31日24时,相关舆情共计370887篇。其中,新浪微博198655篇,客户端96554篇,论坛2709篇,微信11162篇,视频55975篇,网站5721篇,报刊69篇,电视19篇。

资料来源:兰琳宗.今日锐评|坚决维护医疗领域风清气正[EB/OL].(2022-08-28).https://www.ccdi.gov.cn/pln/202208/t20220828_214123.html.

思考:请根据社会放大理论分析风险信息扩散与社会反应机制,进而剖析涟漪效应中风险扩散及放大的效果,为以后相似案例的风险防范提供对策与建议。

即测即练

